

中國文化研究 通讯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2022 年第 1 期

总第 21 期

主办

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基地

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创新智库

西北大学黄帝文化研究院

顾问

张岂之 王亚杰

郭立宏 吴振磊

主编

李 浩

执行主编

张海青 赵 杭

责任编辑

陈战峰 王早娟

刘晓宇 刘 晓

王晨佳 郭 琳

肖 潇

封面题字

袁行霈

◆工作简讯

中心协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十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 2

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园林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推出阶段性成果 / 3

中心邀请华南师范大学蒋寅教授举办学术讲座 / 4

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师生作讲座 / 5

◆专家观点

李 浩 追求卓越学术 通往向上一路 / 6

黄一农 吴国圣 曹寅次婿即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考释 / 10

◆学术平台巡礼

宋辽金史研究院 / 32

◆学者风采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胡可先 / 35

考古专家——马健 / 37

◆新书推介

《黄帝祭文汇编简注》 / 39

《杜甫资料汇编》 / 40

中心协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十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1年12月11日至13日,由中心协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十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大学召开。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刘志斌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原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廖美玉以及原国家图书馆馆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詹福瑞分别为开幕式致辞。会议开幕式由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魏永贵主持。

詹福瑞、卢盛江、戴伟华、钱志熙、罗时进、蒋寅、李浩、康震等八位教授,以及来自台湾成功大学的廖美玉教授、来自美国 St. Peter's University 的江岚教授在开幕式后作了大会主题发言。

本次会议还进行了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中心主任李浩教授被推选为唐代文学学会新一任会长。我校文学院阎琦教授被推选为学会顾问,李芳民教授被推选为秘书长,田

苗副教授被推选为副秘书长,郝润华教授、邱晓副教授被推选为学会理事。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于1982年,属全国性唐代文学研究机构、国家一级学会,学会秘书处设在西北大学文学院。学会迄今已组织举办二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学会会刊——《唐代文学研究》(包括其前身《唐代文学》及《唐代文学论丛》)已出版30辑,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唐代文学研究年鉴》自1983年以来连续出版,系统介绍当年唐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和代表性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参考价值。2021年1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首批优秀社科学术社团奖励性补助,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是当年教育部主管的10家获批准学术社团中唯一挂靠在地方省属高校和西北地区高校中的社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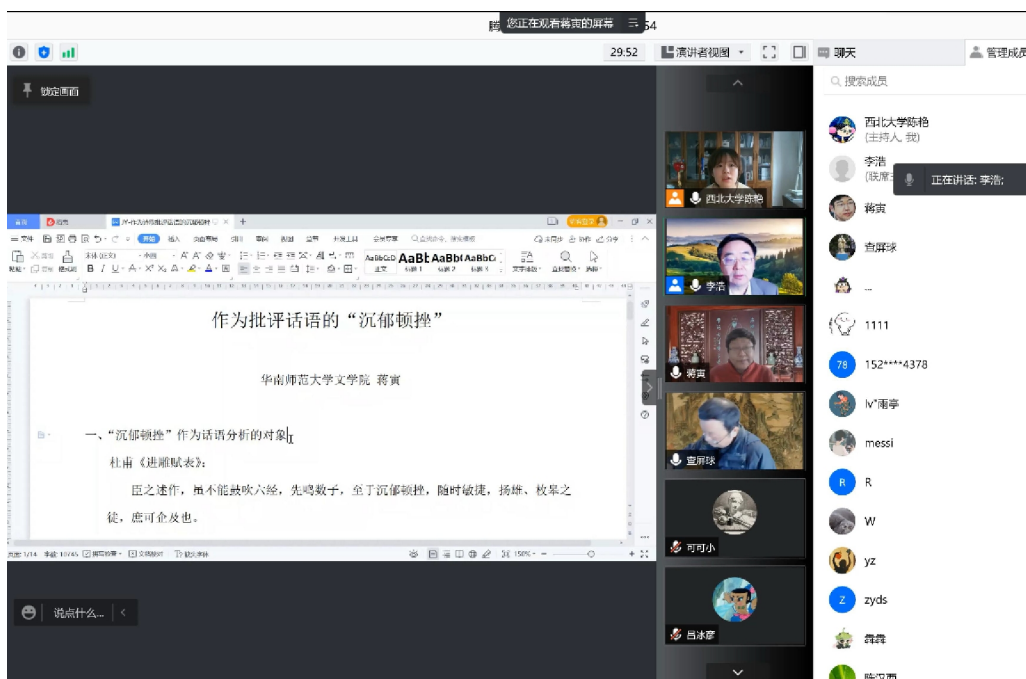
中心邀请华南师范大学蒋寅教授举办学术讲座

2021年12月27日下午,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蒋寅教授受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邀请,通过腾讯会议作了题为《作为批评话语的“沉郁顿挫”》的线上讲座。此次讲座作为西北大学120周年校庆年系列活动之一,由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和文学院主办,香港浸会大学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协办。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主持了讲座,复旦大学文学院查屏球教授担任评议人,校内外师生约两百余人参加了讲座。

主持人李浩教授首先介绍了主讲人的基本情况,蒋寅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唐诗为中心,研究中唐诗歌和

诗人,九十年代以来主要研究中国古典诗学、诗学史,进行清代诗学著作的考索工作。

讲座中,蒋寅教授首先介绍了“沉郁顿挫”作为话语分析对象的来由,接下来探讨了“沉郁”一词的语源,认为“沉郁”指的是辞赋或诗歌写作中用思行气的两种方式之一,与“顿挫”相对立,而“顿挫”的要旨在于改变诗歌意脉的方向和节奏。在梳理了由唐代至清代众多相关诗论后,蒋寅教授指出,我们不应纠缠于推测杜甫的意旨,而应该关注某一文论概念诞生之后,是如何在历代论者的不断诠释中形成多样化的解释和理解的。讲座结束后,李浩教授、查屏球教授分别做了点评,蒋寅教授还针对参会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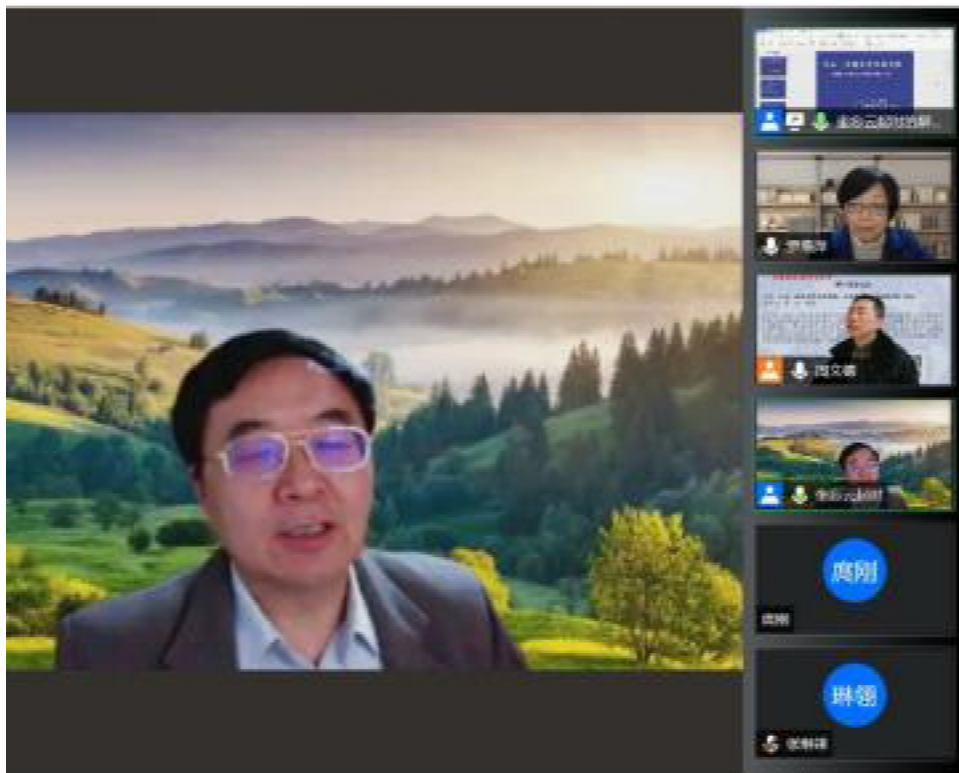
中心主任李浩教授 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师生作讲座

2022年1月6日下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李浩教授应邀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师生作题为“片石、丝路与学术新思维:从《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说起”的线上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周文德教授主持。

李浩教授从《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汉文部分的解读谈起,图文并茂,文史结合,进而引申到对丝路文献及文化研究的思考,扩展到对学术思维与研究方法的体会,提出在学习和研究中应重

视原典、具备贯通融汇能力、高度关注现实与古代文化、文学结合等有深远意义的问题。李浩教授严谨的学术态度、新颖的研究角度及宏阔的研究视野令参加讲座的师生们印象深刻。

讲座的最后,李浩教授与师生们进行了互动交流,并对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学生们提出了自己的期待,希望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夯实学科基础,更具国际视野、未来全面发展。周文德院长评价李浩教授的讲座立意新颖、站位高远、视野广阔,也勉励同学们按照李浩教授所指引的方向努力前行。



追求卓越学术 通往向上一路

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十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致辞

李 浩

主持人罗时进教授、各位嘉宾、各位代表、各位理事：

感谢陈尚君会长刚才的殷殷嘱托，尚君先生的讲话抚今追昔，语重心长，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本次会议从星期五开始，延续了三天时间，现在要暂告一段落了。我最后也说一点自己的感想。

我发言的题目是《追求卓越学术，通往向上一路》。卓越，一般是指顶尖、一流、卓异，同时也指一种领先的、自由的学术状态。卓越可以指学者个人的卓越，也可以指团队的卓越，学术共同体的卓越。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因为要带一点小结的意味，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本届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先后有三场大会报告，十多场分会场报告，论域广阔，内容丰富，对已有话题多有开拓。在学术汇报环节各小组都讲了，查屏球教授刚才做了总结，既全面又有重点，我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强调一点，内蒙古大学为此次会议做了大量的工作，很不容易。以魏永贵院长、高建新教授、米彦青教授为代表的工作团队做了高效的服务工作，让我们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个人认为，本次会议圆满地完成了学术环节的任务。稍微有一点儿遗憾的是，我们在云端上开会，通过虚拟网络进行交流，没有能够亲赴呼和浩特，闻不到奶茶的香味，没有品尝草原白酒的辣味，但这也给我们各位留了一点儿念想。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本届理事会的换届工作。按照学会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和业务主管单位教

育部的要求，学会今年年内务必要完成换届工作。按照程序，昨天上午大会选举成立了新一届理事会，增补 22 位理事。昨天晚上新一届理事会选举了常务理事和学会负责人，增补 8 位常务理事，增补胡可先、查屏球、朱玉麒、刘宁等 4 位副会长，增补李芳民为秘书长。此外，还增补田苗、郭丽为副秘书长，以便加强秘书处的工作。完整的理事会名单，已发到会议工作群内，我这里就不再宣读了。理事会还一致推举陈尚君先生为本届理事会名誉会长，推举周勋初、郁贤皓、董乃斌、薛天纬、阎琦、张明非、葛晓音、莫砺锋、卢盛江、詹福瑞、尚永亮、戴伟华等 12 位先生为本届理事会学术顾问。希望尚君先生和各位顾问，对学会工作能够一如既往地关怀支持。在昨天理事会上，也初步确定了下一届年会的举办地点和承办单位。有几家单位都提出了申请，但理事会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认为四十年前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西安举行的，明年是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故下一届会议建议放在西安开。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代表学校已提出申请，待最终确定后，我们会将时间和地点提前通知各位会员、各位代表。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学会下一步工作的一些设想。这个问题比较有难度，不太容易用几句话说清楚。在昨天的理事会上，我从学术服务的角度，对理事会的工作谈了我个人的一些理解。今天再从促进学术发展的角度，谈一下我对学会工作的理解。

当然,这些都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尚不能代表学会。我想,关于学会的学术发展工作,首先应该将理事会看作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服务机构,将学会看作一个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下面提到的几项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功能展开的。

第一点,礼敬前贤,萧规曹随。学会成立以来,理事会经过多次变化,学人们也经历了几代更替。四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民族有了很大变化,世界也有很大变化,包括我们学会在内的各类学术组织及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纵向的角度看,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人感慨良多。但是,“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学术界的典型犹在,高标永存。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学会工作要进一步提升,主要应该是学术上的创新、深耕和精进。至于管理上,我觉得不必过多地折腾。我们这届理事会原则上不在管理上过多地提什么改革创新,能不调整的尽量不调整。以示对历史的尊重,对成例的尊重,也让学者们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练内功、提升个人学术修为上。

第二点,科学规划传世典籍与文献的整理工作,促进学术情报的了解和共享,关注学术史,加强精细化研究。在昨天开幕式和今天闭幕式上,尚君先生的总结发言提到了传世文献的整理,主要说了已经取得的成绩。我从不足和问题角度说一点。仅举《孟浩然集》的注本为例来说明。2019年,我应邀去台湾地区中兴大学作特聘教授,要开一门“专家诗”的课程。因为李、杜诗都已有人讲,我只好新开了一门“孟浩然诗研究”。为了备课,就做了一些资料搜集的工作,发现孟浩然集的整理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目前重要注本有九种,译注本一种。其中台湾地区的有三种,大陆地区的有六种,日本的重要译注本有一种。请大家注意一下出

版时间,台湾地区,萧继宗先生的《孟浩然诗说》,东海大学1961年初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再版;张学波先生的《孟浩然诗校注》是台湾师范大学中文所1967年的硕士论文;游信利先生的《孟浩然集笺注》由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出版。大陆地区的几个版本,时间很接近。李景白先生的《孟浩然诗集校注》,巴蜀书社1988年初版,中华书局2018年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再版;徐鹏先生的《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曹永东先生的《孟浩然诗集笺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赵桂藩先生的《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李怀福、李延夫先生主编的《孟浩然诗集评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佟培基先生的《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初版,2013年出版修订本。日本黑川洋一先生的《孟襄阳集编年诗注》,由《大阪大学教养部研究集录》昭和58年刊行,昭和58年即1983年,就是我本科毕业的那一年,一直连载到昭和61年,即1986年(第31辑、第32辑、第33辑、第34辑、第35辑)。孟浩然存世的诗歌一共有200多首,这些校注本也有一定差别,不是完全一样,但除了黑川洋一的译注本,基本上都不是编年本。我自己在1983年本科毕业后师从安旗老师攻读硕士学位,选择的也是孟浩然诗的研究,也做过《孟浩然集》的校注,1986年研究生毕业不久,就看到了李景白先生的校注本,不久又看到了徐鹏先生的注本,所以我就放弃了很快把我自己的这个注本推出来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孟浩然诗总量并不多,编年也较难。密集地出了这么多本子,好多是在不知道别人在做这个项目、对学术资讯不了解的情况下做的类似的工作,甚至是重复和撞车的工作。学术研究中,后学者特别应注意盘点学术史,

对已经做过的工作尽量不要重复,不要浪费自己的精力。我后来才知道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这个机构,古委会编有一个简报,从这个简报上我们可以获得很多信息,了解各地学者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每一年国家社科规划办的立项、教育部社科司的科研项目立项,了解哪些项目别人已在进行。当然有一些成果,等你看到出版社图书目录和图书预告的时候,这个成果人家已经完成了。所以,有一些情况可能需要我们学会,通过国家社科规划办、各地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了解信息,也要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样的大型古籍出版机构提前有一些沟通,把一些重要的学术信息提前发布出来,避免出现大家在同一个层面上不断做简单重复工作的情况。学会应该在这方面给会员提供更多的信息,使得会员们能科学地设计研究课题,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第三点,关注历史学界、文学理论学界等相邻学科的新动向和新进展,注重吸收相关学科的新知。有关的全球史、大历史、生态史学、图绘学、科学史、艺术史、宗教史等学科,在近几十年,都有很大的突破。对我们从事断代文学研究来说,颇多启发。我曾经给年轻的朋友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荣新江先生的论文《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二集),后收入荣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先生重点研究了1980年在西安国棉四厂出土的波斯人李素和其妻子卑失氏的两方墓志。这两方墓志刚发布后没有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荣先生非常敏感,对这两方墓志进行了细读,同时联系杜牧《自撰墓志铭》中提到的占卜术,认为杜牧提到的占卜术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占卜术,而应该是波斯系统的或者是托勒密

系统的占卜术。他同时还注意到《都利聿斯经》,以及现在已成为西安碑林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还有其他的一些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史书记载,证明《景教碑》里用叙利亚文提到的“Luka”(汉文翻译为“路加”),Luka后面还写了一个汉文名字“僧文贞”,荣先生认为“僧文贞”与《李素墓志》里提到李素字“文贞”者是同一人。由此发现碑文上大部分的人名乃是波斯人,证明唐代长安景教僧的主体并不是叙利亚人,而是波斯人,他们在唐朝司天台做了大量的工作。司天台的一部分工作是由汉族的或者说儒家学者来做,另一部分则是景教徒,即波斯人来做。明代后期,利玛窦等传教士入华以后,包括在清代,司天监的工作,仍然由两个方面的人来做,有些是中国学者,有些是外国或外族的学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样一种研究,广搜博引而又穷追不舍,需要对传统史籍、新出文献、宗教学、天文学、历法学、丝路学(或者说大历史)等打通,具有非常强烈的方法论的意义,值得给年轻朋友推荐。我们做文学研究,尤其是做唐代文学研究,首先应该对唐代文学典籍文献深读、细读,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解读,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完全赞同,但同时还要密切关注相关学科。近几十年来,我们的一些邻近学科,进步非常快,我们应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是把自己局限起来。

第四点,努力与文物管理和收藏部门战略合作,在提供独特学术服务的同时,也将自己带到新材料的前沿阵地。我在这里也举一个例子,大家百度一下,就在我们开这个云端会议的同时,2021年12月9日,由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一个新的消息:从2020年6月到2021年11月,陕西考古研究人员在咸阳渭城区底张街道和北杜街道发掘了从战国、两汉、西晋、十六国、北朝、隋、唐、

宋、明、清的古墓葬 3648 座,墓葬时代延续长达 2200 余年。发掘地点位于汉、唐长安城北的“洪渎原”墓地。过去研究出土文献的人关注更多的是凤栖原、杜陵原、高阳原,这次集中出现的墓葬都在洪渎原。据考古研究者指出,这个地区出土的北朝、隋唐墓志的墓园特别有特色,目前已发现北朝至隋唐的墓园有 77 座,其中有明确纪年的 23 座,显示出围沟兆域和家族墓园的新特点。这里有很多新的材料、新的现象,值得做新出文献的人关注。我个人觉得,除了关注他们的考古发掘报告、研究结果外,我们学会本身也是以整理、解读、研究文献擅长的学术机构,我们应该主动与他们战略合作,实现双赢。去年到今年,因为扩建咸阳国际机场,做了集中的发掘,新发现和新材料及时公布了。要是在平时,这些工作他们做得很慢,三、五年甚至十年后才公布成果。这样的话我们利用起来就比较难。今后如能以学会的名义,与考古发掘部门、文物管理部门合作,第一时间跟踪这些新材料的动向,这样就把我们利用和使用新材料的时间提前了。我们知道,在现代科学中,发现、发表和利用新材料的时限是很重要的,在十年之后利用这些材料和当下利用这些材料,是不一样的。考古研究院、社科院考古所和我们的学(协)会都是国家的学术机构,学术资源乃天下公器,通过合作,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把这些新材料比较及时、比较准确地发布出来。我所在的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在这方面已经开了一个头,我们已经和昭陵博物馆、黄帝陵园区管委会、榆阳区博物馆等进行深度的合作。唐代文学学会在这方面也应该做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给学会喜欢新材料的学者和文物考古部门的学者,提供更多交流合作的平台和机会。

第五点,将小众的学术新成果,及时传播转化

到教学和大众领域。应该鼓励大学者、知名学者做科普、做教材,这样可以缩短学术原创到学术普及的间隔时间。凡在高校工作者,都会深有感触,我们的本科教材知识更新太慢,包括我们经常使用的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如果让一线的学者编教材、做科普,就可以缩短时间,及时把新知传播给大众,扩大专门学术的接受规模,提升专门学术的接受水平,从而达到开发民智、移风易俗的目的。这方面的工作,前面查屏球教授已经提到了,我们学会有一些老师已经做得很好了。除了传统的编写教材、编写科普读物,我们还应善用新媒体,包括电视讲座、线上课程,甚至自媒体、有声书。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先生以及他的现当代文学团队,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有特色;葛兆光先生也领衔了几个团队,做了一些有声书,做得相当好;古代文学方面,白先勇先生有一个讲《红楼梦》的系列课程,在喜马拉雅上很受欢迎,点击率很高;田晓菲讲《金瓶梅》的有声书也很有特点;以在网络上读金庸知名的网络写手六神磊磊(王晓磊),现在又开设了读唐诗的公众号,阅读传播百万次。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会同仁关注,并学习借鉴其优长之处。

最后,我代表这届理事会表一个态。学术团体里边的职位,无论是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副会长,还是会长,其实都不是什么官,也不是什么“帽子”。更何况就算是一个“帽子”,现在正在破“五唯”、摘“帽子”。但它又确实是一份责任,我们每位理事会成员都有责任,都应该全力服务学术,服务会员。愿我们学会的同仁守先待后,贞下起元,深耕学术,追求卓越,为复兴中华文化,开创学会工作的新局面而不懈努力。

谢谢大家!

(李浩,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曹寅次婿即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考释

黄一农 吴国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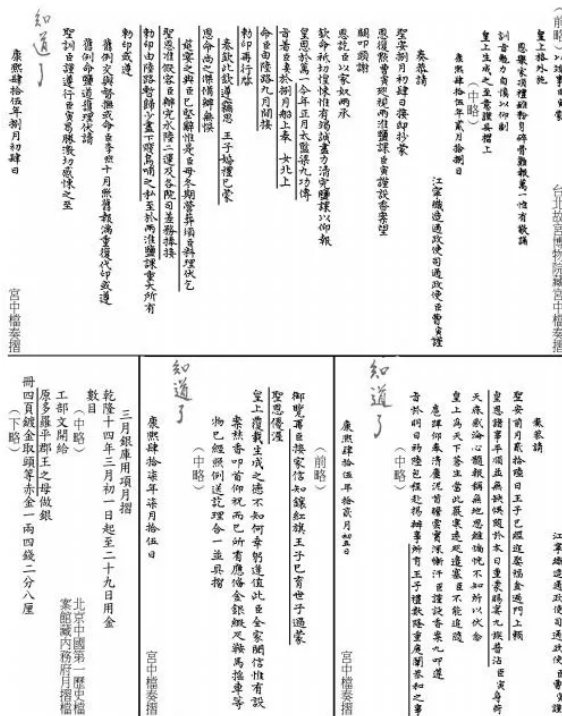
一、曹寅的姻亲

曹寅家籍隶八旗中地位较卑下的汉姓包衣，在入关前后的结婚对象多止于汉军或包衣家族。自曹寅成为家长后，他就先将妹妹（丧父时才七岁左右）嫁给讷音富察氏之傅鼐。傅鼐，字阁峰，满洲镶白旗人，十六岁即入雍邸，与雍亲王胤禛“驂乘持盖，不顷刻离”，故在胤禛登基后遂颇受重用，雍正帝尝称“朕即位以来，所用在廷大臣、外省督抚皆出于至公，并无平素熟识之人，惟年羹尧、傅鼐系藩邸旧属”。^[1]雍正二年十一月他自一等侍卫升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十二月授兵部右侍郎；三年四月调盛京户部侍郎；四年八月以与隆科多交结且收受贿赂，遭夺官戍边；九年，召还，赏原衔赴大将军马尔赛军营效力；十一年七月平郡王福彭（曹寅长婿纳尔苏之长子）以定边大将军衔征准噶尔时，傅鼐亦曾参赞其军。乾隆帝登基之初授内务府总管，寻擢刑部尚书兼理兵部；二年，授正蓝旗满洲都统；三年，以事入狱，获释后旋卒。^[2]

另，曹寅有两女，其婚姻也让曹家跻身到更高的社会阶层。长女被指婚给平郡王纳尔苏（或作纳尔素、讷尔素、讷尔苏、纳而素；礼亲王代善裔孙，四十年十月袭平郡王，雍正四年遭革爵），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北京成亲，是清朝第一位且以后亦极其罕见之出身汉姓包衣的嫡福晋，^[3]当时皇帝还指派时任内务府郎中的尚之杰备办婚礼事宜（图一），^[4]益知曹家得宠的

程度。

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曹寅长女生长子福彭（1708-1749），后又陆续生第四子固山贝子品级福秀（1710-1755；其妻为纳兰揆叙长子永寿的长女）、第六子三等侍卫奉国将军福靖（1715-1759）、第七子福端（1717-1730）。福彭于雍正四年七月袭多罗平郡王，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薨，谥曰敏。其长子庆宁（1733-1750）于乾隆十四年三月袭多罗平郡王，十五年九月薨，谥曰僖。庆宁无嗣，福秀嫡长子庆恒（1733-1779）于乾隆六年三月过继长房，十五年十二月袭多罗平郡王，二十七年闰五月缘事降为固山贝子，革去所



图一 与曹寅长婿相关的档案

管事务,四十年闰十月复封郡王,四十三年正月复克勤郡王号,谥曰良。^[5]亦即,曹雪芹在世期间共经历其姑丈纳尔苏、表兄福彭以及表姪庆宁、庆恒三代四任的平郡王,此应是先前学界所知其家最位高势重的姻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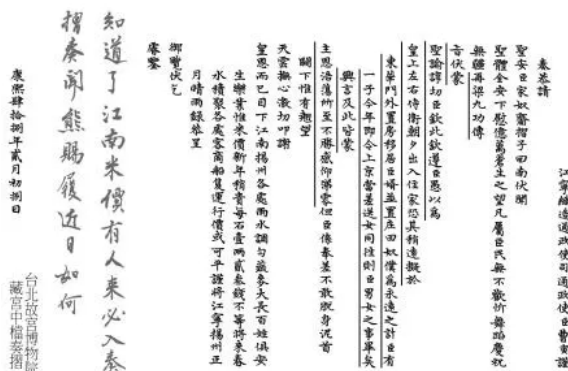
福彭于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临终前曾上一遗表替母亲争取复封,称:“臣母曹氏未复原封,孝贤皇后大事,不与哭临。臣心隐痛,恳恩赏复。”此虽无例可援,但十四年二月得旨,如其所请。^[6]在是年三月的银库用项月摺档中,即可见到内务府为制作诰封福彭生母之镀金银册时,所取用头等赤金的用料量(图一左上)。^[7]由于孝贤皇后卒于此年三月,从曹氏因未复原封而不得参与哭临一事,知曹寅长女于十四年二月尚存,时年约六十岁。^[8]

至于曹寅次婿的身分,却一直成谜,下文将尝试打开曹家这扇学界全然未知的窗口。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初八日曹寅在奏折(图二)中有云:

臣愚以为,皇上左右侍卫朝夕出入,住家恐其稍远,拟于东华门外置房移居臣婿,并置庄田、奴仆,为永远之计。臣有一子,今年即令上京当差,送女同往,则臣男女之事毕矣。^[9]

虽然摺中已言“臣婿”,但又称“臣有一子〔指曹颋〕,今年即令上京当差,送女同往,^[10]则臣男女之事毕矣”,知当时曹寅次女尚未成婚,但应已于先前与该侍卫文定。又,此婿的经济状况显然不佳,故得仰赖曹寅代置房产,并购买庄田、奴仆以为“永远之计”。

萧猛(字爽龄,号席园,扬州府江都县人,康熙三十五年的府学恩贡生)在其《永宪录》续编中



图二 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与曹寅次婿相关的奏折

曾论及曹寅两女,称:

颋之祖□□与伯寅相继为织造将四十年。寅字子清,号荔轩,奉天旗人。有诗才,颇擅风雅。母为圣祖祖母,二女皆为王妃。及卒,子颋嗣其职。颋又卒,令颋补其缺,以养两世孀妇,因亏空罢任,封其家赀,止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而已,上闻之惻然。寅演《琵琶传奇》,用蔡文姬故事,以正伯喈之诬,内装潢魏武之休美;或谓其因同姓,然是举实阿瞞一生好义处。又演明末米脂令边大绶与陕抚汪乔年掘李自成先冢所纪《虎口余生》,将一时人物备列,表忠义而禡叛逆,可敦风教,并附志之。^[11]

萧猛与久任两淮盐差并开办扬州诗局的曹寅在时空上很可能有重叠,因如顾图河(萧猛同乡友人,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榜眼,曹寅有诗赠之)、汪绎(顾图河同科状元,曾参与曹寅在扬州校刊《全唐诗》之工作)、曹殷六(曹寅的同姓表兄)、王文范(曾任曹颋蒙师,且是曹寅“最契密”的好友)即同出现在两人或其亲朋的交游圈,^[12]知萧猛应不乏渠道能对曹寅的家事有所掌握。

无怪乎,在《永宪录》(正文记事暂以乾隆十

七年为其下限^[13])中不仅记载了曹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的宫闱秘事,^[14]甚至对其新编《后琵琶》和《虎口余生》的内容也有确切掌握。亦即,该次婿后亦封王的真实性颇高。惟学界一直不知此婿究竟何人,红友兰良永间接推测他最可能是蒙古贵族,惜受研究条件所限,未能进一步耙梳,^[15]下文即尝试加以深入析探。

二、曹寅次婿即罗卜藏丹津

由于康熙下半叶以后的封王者只可能出自宗室或藩部,^[16]经全面翻查《清史稿·皇子世表》后,在康熙四十八年至乾隆十七年的四十四年间,共发现有 52 名宗室封王(含 11 名追封者)。而 1938 年最近一次刊刻的《爱新觉罗宗谱》中理应记载所有福晋的姓氏及其父亲名衔,然在细阅后,并未见其中有人曾娶曹佳氏或曹氏为福晋。^[17]亦即,曹寅次婿应为外藩。

再检《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前十六卷中的各袭爵表(记事止于乾隆五十三年,惟所记王爵皆为世袭罔替),知从康熙四十八年至乾隆十七年间,共有 84 位外藩曾被封为郡王或亲王,他们全属蒙古,无一为西藏或回部。^[18]透过大数据逐一耙梳《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各王的生平事迹后(主要另参据《清实录》《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平定准噶尔方略》),^[19]发现前述这些外藩王应均非曹寅次婿的可能人选。至于筛选的理由则有下列几类:

1. 康熙四十八年二月之前的名衔已高于侍卫。

2. 康熙四十八年二月之后才归顺(故之前不可能已任侍卫)。

3. 康熙四十八年前后不久尚宗室女(因曹寅应不会让次女为人做妾,故该侍卫不太可能又娶

宗室女)。

4. 其家已袭爵好几代(故其家不应经济太窘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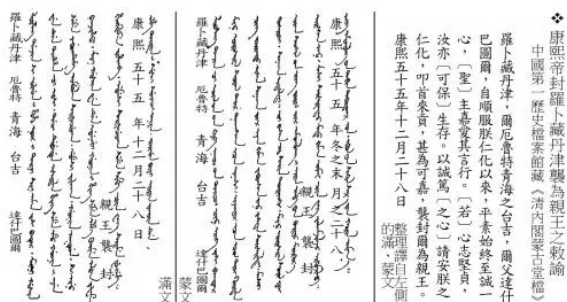
5. 死后其家仍袭王爵(故不应少有人提及此婿)。

事实上,这些候选人几乎皆可因其家已袭爵好几代或死后其家仍袭王爵而加以筛除,且许多案例往往符合不止一类理由(附录一)。

倒是在翻查《清实录》时(依其体例,应记载所有封王之事,但因相关内容散在书中,故较难耙梳),发现另有 5 名曾封王者,他们或是死后才追封,或是因其本人或家人叛清遭褫爵,以致未被列入《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袭爵表。其中颇罗鼐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父子归顺时已在康熙四十八年二月之后,故不可能是曹寅次婿,另有 2 人可依前述理由排除(附录二),只有五十五年十二月封青海和硕亲王的罗卜藏丹津(Lobdzan Dandzin)较可能为此婿。下文即对这位自 141 名封王的宗室或外藩中所筛检出的最佳候选人详加申论。

受厄鲁特(元明时称瓦剌)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侵扰,紧邻的和硕特部于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举部向清朝归诚,其首领达什巴图尔(1632-1714)偕青海诸台吉入觐,清廷欲陈兵威,十二月大阅于京郊的玉泉山,达什巴图尔等扈驾往观,战栗失色。三十七年正月,诏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二月,康熙帝幸五台山,诏达什巴图尔等从,后给予驼马并温谕遣归。四十二年十二月,康熙帝幸西安府,达什巴图尔再度来朝,扈驾阅兵,赐宴遣归,五十三年九月卒(曹寅已于五十一年七月病逝,子曹顥在是年十月补放江宁织造)。达什巴图尔的独子罗卜藏丹津至迟在五十四

年十二月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欲与其族姪察罕丹津结盟率兵攻伐异己,^[20]知其当时人已在青海并掌握了亡父的实力。罗卜藏丹津于五十五年闰三月已获“青海右翼台吉”衔,十二月袭亲王(参见图三;曹頌甫于五十四年正月继其兄曹顒为江宁织造),雍正元年叛清,翌年兵败后逃往准噶尔。^[21]



图三 康熙五十五年罗卜藏丹津袭封亲王之满、蒙文敕諭

乾隆二十年清军攻灭由达瓦齐所统治的准噶尔汗国,罗卜藏丹津亦“投帐下,俛首受缚”,^[22]但为避免引发激变,特旨将二人皆赦罪。并加恩封达瓦齐为亲王,赐宅第在京居住,且授以御前侍卫,更将已革理亲王弘皙(废太子允礽的次子,乾隆四年因逆案遭革爵圈禁)的第十二女指配给他,稍后又将庄亲王允禄第六子弘明(与允禩次子同名)的次女嫁给达瓦齐的长子罗布扎(二十四年七月其父薨逝后仍准降袭郡王)。^[23]此外,亦命罗卜藏丹津留京,赏给房屋一所居住,但不许擅出,其两子巴朗及察罕额布根被安排隶内蒙古正黄旗旗分,授蓝翎侍卫,在司辔上行走,其眷属则留伊犁,于北京另行赏给两人妻室(但似非宗室)。^[24]该将达瓦齐及罗卜藏丹津两子均授为侍卫并赏给妻室的笼络之举,恰与曹寅次婿的际遇如出一辙!

根据那段期间在青海地方传教之天主教方济各会士叶崇贤(Giovanni Battista Maoletti de Seravalle, 1669-1725)所记,罗卜藏丹津生于康熙三

十二年(图四)。亦即,四十八年曹寅奏呈其次女即将成婚时,他虚岁为十七,正值婚龄。若罗卜藏丹津就是曹寅的次婿,他在袭爵之前应曾在京被宠以侍卫一职,但同时亦扮演某种质子的角色,而受康熙皇帝封为亲王的达什巴图尔,很可能也希望双方能藉此开展类似清廷与漠北蒙古、阿拉善蒙古或漠南东三盟蒙古间的较密切关系,^[25]以对抗共同的敌人准噶尔。

当时厄鲁特降人在战乱中的境遇颇惨,甚至有“无衣服铺盖”者,故谕旨应“完其夫妇,给以衣食”,^[26]并屡以当中的青壮贵族为侍卫:如三十五年十二月就一口气授十几人为蓝翎以上侍卫,其中土克齐寨桑、米寨桑、韩都台吉为一等侍卫,马穆古英寨桑、哈尔巴达尔汉寨桑、丹巴额尔德尼寨桑为二等侍卫等;^[27]三十六年闰三月又授格垒沽英为散秩大臣,子吴巴什一等侍卫;^[28]三十六年九月率家属来降的丹济拉,亦获授散秩大臣,子多尔济塞卜腾一等侍卫。^[29]



图四 青海古地图上有关罗卜藏丹津生年之记载^[30]

康熙四十年六月尝谕喀尔喀台吉等曰：

兴安境内，尔等数旗，穷困已极。自噶尔丹之事以来，尔诸蒙古朕皆一体豢养，尔台吉内尚有无马徒步者，身系台吉，何至如此！尔蒙古等度日甚无成算，今将台吉内有马一骑者，给牝马九；有二骑者，给牝马八；有三骑者，给牝马七；有四骑者，给牝马六；有五骑者，给牝马五；无马贫穷台吉，皆给牝马十……八年后将所给原数，仍交牧场其孳生之马……朕令尔等立业如此，倘仍难度日，虽彼苍亦不能救尔也。^[31]

愿提供牝马给较贫穷的台吉养育以维持生计。是年九月甚至将被擒获的噶尔丹（三十六年四月仰药自尽）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授为一等侍卫，且将噶尔丹之女鍾齐海指配给二等侍卫沙克都尔。^[32]

再者，年羹尧于雍正元年十月初十日所上的满文奏折中，记罗卜藏丹津曾自述其起兵的缘由曰：

汝等所寄文书内，称我为“反叛主子之罪人”。我无背叛圣主之处。吾自小至长，从恶向善之所蒙恩者，皆由主子之恩威，全非鄙力也。^[33]

若罗卜藏丹津从未有在宫中任侍卫的经历，而是一直在其父亲青海亲王的身旁成长，他应不会有“吾自小至长，从恶向善之所蒙恩者，皆由主子〔指康熙帝〕之恩威，全非鄙力”的阿谀说词！又，雍正帝于五年十二月敕谕收容罗卜藏丹津之噶尔丹策零（噶尔丹姪孙，准噶尔汗国的首领）时有云：

罗卜藏丹津乃青海和硕特扎什巴图尔之子，伊骨肉中无故弄兵，互相残害……罗卜藏丹津乃敢悖

我皇考圣祖养育之恩，负朕之德，侵犯内境……尔务须将罗卜藏丹津送来，朕念伊父扎什巴图尔从前劳绩，断不将伊诛戮，仍施恩豢养。^[34]

所谓“悖我皇考圣祖养育之恩”“仍施恩豢养”的语意，似均指罗卜藏丹津曾在康熙帝身边当差并被培养。

曹寅奏折中亦屡见“豢养”一词，如称“世蒙豢养，生歿殊荣”“自幼荷蒙圣恩豢养”“从幼豢养”等，而他于康熙十八年二十二岁之前曾授三等侍卫。^[35]又，尝自谓“由垂髫豢养……多年训海，至于成人”的福康安，在乾隆三十二年即以云骑尉世职授三等侍卫，时年才十四岁。其弟福长安也自幼养于宫中，初授蓝翎侍卫，故当嘉庆帝痛斥他是和珅的同党时，即提到他“蒙皇考豢养二十余年”。当时始任侍卫的年龄虽通常在十八岁左右，但一些宗室或勋旧重臣的下一代，往往于十五、六岁甚至更年轻时即侍直禁廷，特意提早培养。^[36]亦即，罗卜藏丹津确有可能以担任侍卫的方式当差，尝试建立和硕特部与清廷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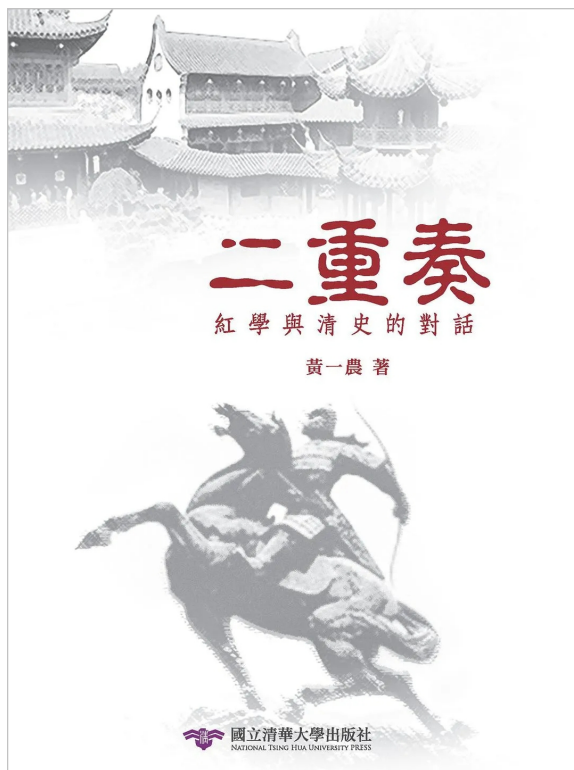
质言之，清廷当时受噶尔丹之乱的影响，故多方笼络归顺的蒙古贵族，亦即，罗卜藏丹津长成后被授以侍卫并为其指配一事应颇可能，尤其，该羁縻做法甚至连掳获之降人中亦见。至于曹寅何以支持此一婚事，^[37]除因康熙帝指配外（见后），则或因达什巴图尔是当时和硕特部唯一的亲王，且罗卜藏丹津乃其独子，故可预期他将来袭爵并令寅女成为王妃的可能性甚高。而曹寅家对御驾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战事一直相当关切并有深入掌握，如在三十五年七月两江总督范承勋的奏折中即称：“圣主亲征百日内剿灭噶尔丹之事，虽于邸抄、人之所传略有所闻，然每次均

无头绪。顷接织造郎中曹寅家书，闻之大概。今将圣主所行奇事，总督与我等阅视，方才细知圣主之奇行、密谋，荡灭厄鲁特如围猎等情。”^[38]此或也是其较易接受与蒙古联姻的重要背景因素。

检顺、康间为外藩安排的联姻多是宗室女，但因皇室联姻的针对性很强，而青海厄鲁特部先前从不曾尚宗室女，^[39]故与皇帝私人关系密切且经济上优渥的包衣家族，就成为彼此可互补的婚配对象。尤有甚者，康熙帝既可开先例为宠臣曹寅的长女指婚平郡王纳尔苏，令其成为清代首位出身汉姓包衣的嫡福晋，应也可能授意曹寅将次女嫁给青海和硕亲王之子。^[40]

此外，曹家亲友中当时亦不乏有蒙古经验者，如曹寅于康熙四十一年左右曾赋《闻二弟从军却寄》，^[41]记其弟曹荃从军一事，而诗中即出现“伏闻攘狄开边隅”句。与曹寅同姓的“殷六表兄”，也于四十年有“南走僇耳，北度瀚海，舞箠跃马，奋扬英华”的经历，“瀚海”即指戈壁沙漠。^[42]至于曹寅在《虎丘雪霁追和芷园看菊韵，寄松斋大兄、筠石二弟》诗中所提及的大兄曹松斋，其友李振裕亦曾于康熙三十七年为他赋有“只今瀚海囊戈日，正好临风检素书”句，“囊戈”音“高”，原指收藏弓矢、盔甲的袋子，“囊戈”乃引申为战事停息，此应指三十六年御驾亲征噶尔丹一事。^[43]又，省亲的科尔沁和硕敦恪公主（康熙帝第十五女）于四十九年在京薨逝，当时纳尔苏也曾与多罗安郡王华斌一同护送其遗体归葬蒙古。^[44]这些人当中不知有无人曾与三十六年归顺清朝的达什巴图尔接触过？

事实上，如无康熙帝的介入，身隶内务府的曹寅，做为直属皇帝的“包衣下贱”，且每月几乎皆有密摺进呈，恐不敢私自与蒙古亲王为儿女缔



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亲。此或可合理解释他何以在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初八日的奏折(图二)中记称：

梁九功传旨，伏蒙圣谕谆切，臣钦此钦遵。臣愚以为皇上左右侍卫，朝夕出入，住家恐其稍远，拟于东华门外置房移居臣婿……兴言及此，皆蒙主恩浩荡所至，不胜感仰涕零。但臣系奉差，不敢脱身，泥首阙下，惟有翹望天云，抚心激切，叩谢皇恩而已。

该由太监梁九功所传的“圣谕谆切”之旨虽具体不详（曹寅长女的婚事也是由梁氏传旨；图一），然曹寅紧接着所谈及其对次婿的生活安排，应就是“钦此钦遵”所为，他还称此“皆蒙主恩浩荡所至，不胜感仰涕零……惟有翹望天云，抚心

激切，叩谢皇恩而已”。至于陈述己为次婿置田产、买奴仆的私事（此举对该婿应很没面子），^[45]一般说来是不太会主动对外人言，益知此一婚姻乃出自特恩安排，曹寅在摺中只不过低调地禀告皇帝他已遵旨妥为处理。

罗卜藏丹津的个人资料罕见于汉文文献,故中国学界过去即长年对其妻室一无所悉。我们最近在藏文典籍《དབལ་བསམ་རིན་པོ་ཆའི་སྟེ་མ(满愿宝穗)》一书中发现有相关记载(图五),^[46]指称藏历木马年(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岁)十二月某日,七世达赖的帐幕附近涌出一口泉水,时值丹津亲王(བསྟན་འཛིན་ཆེན་མང,即罗卜藏丹津)与夫人崔措(chos 'tsho; ཆོས་འཆོ)造访。此泉刚出现时,可见三个泉眼直往上冒,观者甚为惊奇,目为神迹。达赖喇嘛因此指示“在各个泉眼上设立我(达赖)、丹津、al thas(ཨ་ཐ་ས་ཐ་ས)、崔措等人的旗幡,并念经祭祀五日”,^[47]其中崔措与 al thas 皆是罗卜藏丹津的夫人。由于罗卜藏丹津迄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才正式袭封(其父于五十三年九月已薨),知所谓的“丹津亲王”或为追记此事时的尊称。^[48]

同书中还数度提到罗卜藏丹津携其夫人们曾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或活动,显见两人间的互动紧密,而除了以上设立旗幡的引文外,其行文顺序多半是以崔措紧接在“罗卜藏丹津”之后。^[49]当三人并列时,则依序为“罗卜藏丹津”“夫人崔措”与“夫人 al thas”(图五)。^[50]亦即,崔措是嫡福晋的可能性最大。此外,我们还能从人名本身得到更进一步的讯息:“chos 'tsho”两字的直译分别为“法”及“生存 / 饲养 / 医治”,不仅与藏文的习用语不合,也罕见藏族以之为名,而此种构词与发音亦未合蒙古人名,不知“崔措”一名有无可能内含曹寅次女汉姓之对音?^[51]至于另外一位夫

人 al thas, 则完全非藏语, 而是音译, 且从首音节“al”来看, 很可能是位蒙古妃子。

罗卜藏丹津不仅在康熙五十三年时已有两位夫人,从文献中得知他还有其他婚配对象。此因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年羹尧奏称:

臣窃查知“圣主将丹忠之眷属赏给察罕丹津时，墨尔根戴青拉察布因察罕丹津独占丹忠之眷属，而不归心服从。将其〔拉察布〕妻，即达赖喇嘛之姊给予罗卜藏丹津，并（与罗卜藏丹津）协力掠夺察罕丹津”等因，甚为可恶。^[52]

该娶七世达赖姊的拉察布(拉查卜、拉叉布,满文名 Lacab)是察罕丹津兄之子,他因不满察罕丹津在姪贝子丹忠过世后,独占丹忠的家口及属下,遂附罗卜藏丹津,^[53]并以己妻给之。雍正帝稍后在年羹尧的另摺中,对此事有硃批曰:“大笑”



图五 汉、满、藏文献中有关罗卜藏丹津妻室之记载

话,拉察布怎么样了?(*amba yobo, Lacab aina-habi*)!”^[54]又,年羹尧亦奏称罗卜藏丹津与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最厚,“必欲占拉叉布之妻以为小妻者,亦因此结为姻娅,藉为西藏之内援耳”(图五)。^[55]至于罗卜藏丹津娶再醮之达赖喇嘛姊为“小妻”(通常虽指妾,^[56]然此应属西藏的多妻婚俗)一事,究竟是其主动攫夺还是被动获赠(图五),则已难考实。但因两家的关系原本就十分密切,知此婚姻明显带有政治意图。无怪乎,不仅青海地区的喇嘛多闻风响应罗卜藏丹津的起事,连西藏亦为之震动。^[57]

三、大历史、家史与小说的对话

罗卜藏丹津在叛清兵败后逃亡准噶尔,雍正二年闰四月其党羽吹拉克诺木齐等人被解送至京,行献俘礼,且遣官祭告太庙、社稷。^[58]三年五月雍正帝更将千余字的《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文》颁发郡邑,痛斥罗卜藏丹津。而查索“中国方志库”等数据库,可发现雍、乾间各郡县将此文勒石于学宫者至少近百通。乾隆皇帝在六年十二月序《世宗宪皇帝实录》时亦称:

圣祖亲统六师,平定朔漠,威灵所加,青海扎什巴图尔等震誓承令,因沛殊恩,畀以爵秩,垂三十年,而罗卜藏丹津与吹拉克诺木齐等诞敢首造逆谋,扰犯边域。皇考声罪致讨,密授方略于阃帅,戈鋌所指,电扫风驱,振旅献俘,勒成功于太学。^[59]

二十年五月擒获罗卜藏丹津时,又再度告祭太庙、社稷,行献俘礼,由乾隆帝亲御午门楼受之。^[60]前述的献俘礼乃入清以来最早的两次,因皆与罗卜藏丹津之乱相关,知其在雍、乾两朝应是一位举朝皆知的国家罪人。^[61]故即使其青海亲王的爵位

要较长婿平郡王为高,曹家亲友应无人会在公开出版的诗文中触此痛处才对,而官方文献亦因曹家地位不高而未提及此婚姻。

曹寅于五十一年所赋的《畅春苑张灯赐宴归舍恭纪》《正月二十九日随驾入侍鹿苑,二月初十日陛辞南归,恭纪四首》,是其极少数涉及外藩的诗文(图六),他在字里行间颇得意有此殊遇,^[62]此二诗或值得进一步探究。查康熙中晚期为笼络外藩,设“朝正外藩宴”(“朝正”指诸侯和臣属于正月朝见天子),每年举行三次:一是除夕,在保和殿;二是正月十四,在畅春园;三是正月十五,同在畅春园。五十年十二月三十日午时,上御保和殿,以岁暮宴朝正外藩诸王。翌年正月初二日驻蹕畅春园,十四日在园内的“万树红霞”胜景,以上元节的灯戏、火戏等表演活动,赐朝正外藩蒙古诸王公,参加者除左翼科尔沁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巴特马、右翼喀尔喀和硕亲王达锡敦多普等二十九名外藩的王、贝勒、公、台吉外,另有内大臣、侍卫、大学士等。其中巴特马及达锡敦多普二人行至御座前,由康熙皇帝亲授饮,余者俱令侍卫于其坐次分觞授饮。十五日午时,又再度于万树红霞赐宴朝正外藩。清廷乃利用上元筵宴的外交舞台,尤其是透过灯火戏表演所产生的威慑效应,以遂行其怀柔的政治目的。^[63]

曹寅的《畅春苑张灯赐宴归舍恭纪》(图六)应就是在出席正月十四或十五日的畅春园御宴之后所赋,诗中的“兰台异数曾沾渥,赋拟枚皋拙未能”句,先指出他能以两淮巡盐御史的身分(“兰台”为御史台的别称)参与此宴应属蒙受特恩的异数,自己原本欲写一篇赋记盛,惜未成(枚皋为汉武帝时的文学家,以下笔敏捷知名,受诏辄成)。“忆祝尧年书甲子,重瞻玉历纪壬辰”句,

或谓他想起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岁时曾以侍卫的身分初次参加此宴,至五十一年壬辰岁才又再度获邀。“狂收瀚海鲸鲵靖”句乃指平定噶尔丹等,因鲸和鲵会凶猛吞食小鱼,故用做凶暴不义者之喻。至于“遐荒旃毳仰陶甄”与“乍眩青红列只孙”句,均描写蒙古贵族的穿着,其中旃(音“沾”)毳(音“翠”)是指以鸟兽毛皮所制的衣服;陶甄本为制造陶器所用的旋盘,比喻运筹帷幄、治理天下的君王;“只孙”亦作只逊、质孙、济逊等,蒙古语 *jisü(n)* 的音译,^[64]原指元代参加内廷大宴时所穿的官服。

曹寅在正常状况下本无资格参加“朝正外藩宴”,因其既非外藩的王公,亦非内大臣、侍卫或大学士。但罗卜藏丹津应可以侍卫的身分与宴,而其父达什巴图尔亲王当年虽未入觐,但他仍是青海和硕特部最具影响力的贵族,曹寅很可能就因其亲家的身分,以及他对次女与蒙古联姻一事的全力配合,而获康熙帝特邀与二女婿一同参加此宴(若该婿确为罗卜藏丹津,此应是他在婚后首次赴朝正外藩宴),遂有前诗中的“兰台异数曾沾渥”之谓。

在上元之后春节即告尾声,各级政府于正月十七日辰时皆开印办公。然因康熙帝仍驻跸畅春园,故部院各衙门的奏章每日皆交内阁,再由内阁转送畅春园听理,但应面奏事件仍行面奏。二十九日,康熙帝自畅春园启行巡幸霸州等处。^[65]曹寅初或随行,并赋有《正月二十九日随驾入侍鹿苑,二月初十日陛辞南归,恭纪四首》(图六),诗中在“期门百队龙旂后,更有名王万骑陪”后,注称“喀尔喀、厄鲁德〔特〕尽归旗,奉藩来朝”,期门原指东汉明帝时期外戚樊、郭、阴、马四姓的子弟,后引申为功臣子孙的代称;“旧属饮飞能搏

虎,分番郎舍尽攻文”句,则提及随驾的队伍中亦可见他原任侍卫时的部属,现已多允文允武,饮(音“次”)飞本为古代勇士,汉武帝时以之为武官名,因其着轻装疾驰若飞(与字义同);^[66]“府制精严备圣朝,漫言干戚靖三苗。请看边海车书会,坐致蛮荒兵甲销”句,称誉领侍卫府的侍卫,干戚谓征战(干的本意为盾牌,戚为大斧),边海指戈壁大漠,车书谓推行制度;曹寅且以“束发旧曾充狗



图六 康熙五十一年正月曹寅恭纪畅春园张灯赐宴诗

监”句,怀念年轻时在御前当差的岁月。

曹寅的次女乃于四十八年二月之后始在北京结亲,确切时间不详,然因曹寅做为主婚人,理不应缺席才对,故我们或可从其行程略加推判成婚的时间。检曹寅于四十六年冬盐差任满后即返京覆命(大致隔年一次),十二月十八日陛见,随具摺条陈织造事宜六款,于四十七年二月初三日面奉圣谕:“除修理机房、船只,停支买办银两三

件准行外,惟制帛、线罗、浩命,每年应用若干,工部现存若干,须核实再一并启奏。”二月十一日曹寅离京,由兖州府中路至江宁,三月初一日抵衙门,当日即奏称“臣蝼蚁下贱,过蒙圣恩,感激涕零,涓涯莫报”。是年七月十五日曹寅接家信,得知长女已为平郡王诞育世子,亦奏曰“过蒙圣恩优渥,皇上覆载生成之德,不知何幸,躬逢值此。臣全家闻信,惟有设案焚香,叩首仰祝而已”。九月初一日曹寅因被复差巡视两淮盐课,^[67]他在谢恩摺中呈称“窃念臣系包衣下贱,过蒙皇恩优渥”。此后至四十八年冬,曹寅才又回京述职,四十九年二月初二日他曾扈从康熙帝出发巡游五台山,三月返抵扬州,回南途中曹寅写下《和同人东村招饮见怀三首》,中有“老傍期门队,归乘使者车。南辕兼北辙,筋力竟何如”句(图六),应就是描述返南时曾扈驾侍从。曹寅下次再回京则是五十年冬。^[68]

曹寅应在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陛见时获康熙帝为其次女指配,^[69]接着在翌年正月与女婿见面并谈妥婚事,并订于曹寅下次返京述职期间完婚。四十八年二月曹家即先由曹颀伴妹至北京准备婚事,并为妹夫置产,曹寅乃于四十八年冬返京,婚礼应安排在四十八、九年之交举行。由于康熙帝对曹寅两女婚姻的指配都远超乎常情,长女又替平郡王生下世子,且命曹寅续接盐差,难怪曹寅会在前引四十七年的三份奏折中,皆以“过蒙(圣恩或皇恩)”来深表对这些逾格特恩的感激之情,而曹寅尚存的一百多件奏折中,就仅这三次出现“过蒙”一词!^[70]

曹寅两女皆为王妃的殊遇,或亦反映在曹雪芹的小说中。当然,《红楼梦》并不是一部历史实录,我们也无法以其内容去具体印证曹家未知的

历史,但作者却很有可能将发生在其周遭亲友之极特殊的境遇,勾兑融入他所编写的部分故事情节当中,以增加小说的精采度。而由于这些罕见境遇的独特性,即使该情节已与史事有所距离,我们或仍可窥见其原型所残留的痕迹,此应远非单纯的巧合所能合理解释。曹寅长女于康熙四十五年嫁为平郡王妃一事,已属清代包衣女子的罕例,接着次女亦于五十五年受封为青海亲王妃,对小说创作者曹雪芹而言,该极其特别却又罕为人知的家史,似乎具有难以逃脱的吸引力,《红楼梦》中或因此留下蛛丝马迹。

检《红楼梦》中的要角之一贾探春,是故事主人公贾宝玉的庶出妹妹,曹雪芹在第五回中以《分骨肉》一曲揭露探春的命运,其词曰: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莫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命,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而宝玉在金陵十二钗正册所看到的判词中,亦称探春:

才自清【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并指出该册上还画着两个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至于画中所放的风筝,则象征有去无回,正如第二十二回探春灯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所射的物件,而庚辰本的脂批在此亦以夹注记:“此探春远适之谶也。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

孙不至流散也。”点出探春最终应是嫁至远方。

接着,第六十三回描述探春在夜宴中掣得杏花签,因其诗“日边红杏倚云栽”有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一杯,共同饮一杯。”故众人笑道:“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此处的“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句有些突兀,因与小说中贾元春的贵妃身分不合。由于王妃原本只用来代称郡王或亲王之福晋,皇帝的妃子应作“皇妃”才对,然以曹雪芹替小说中各角色取名时往往有一语双关的习惯,笔者怀疑贾元春的原型除借用真实世界里的密妃王氏,^[71]还将被指婚平郡王正妃的曹寅长女化入故事。至于称探春“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则是反射了曹寅次女亦成为青海亲王嫡福晋的家史。又,第五回《红楼梦曲·虚花悟》中有云:“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见把秋挨过?”,其中的“云中杏蕊”应就指身为薄命司中人的探春,她虽得贵婿,但最终还是逃不脱“谁见把秋挨过”的结局。^[72]

小说后四十回中对探春远嫁的对象还有一些描述,第九十九回指出向贾政提亲的是其“调任海疆”的同乡:“镇守海门等处总制”周琼。虽然“海疆”给人的直觉多谓东南沿海,^[73]但因前文已耙梳出曹寅次婿之父,很可能就是康熙三十七至五十三年间统领青海和硕特部的亲王达什巴图尔,令人怀疑“海疆”也有可能是指代戈壁沙漠的“瀚海”或“边海”。有意思的是,北大日籍教授儿玉达童曾于1943年提及他在日本所见过的“三六桥本”《石头记》(今下落不明),其中即有探春出嫁外藩的情节。^[74]至于探春在贾府被抄之前远适,也与曹寅次女在曹家被抄之前出阁的情形相合。

而蒙古藩王在《红楼梦》之末亦有一些角色,如第一百十七回记邢大舅、王仁(巧姐的舅舅)等人在贾家外书房喝酒时,有位陪酒的骗说:“现今有个外藩王爷,最是有情的,要选一个妃子。”第一百十八回称该外藩郡王打发人来家相看巧姐,平儿猜必是相亲的,称:“到底不知是那府里的。若说是对头亲,不该这样相看。瞧那几个人的来头,不象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头路数。”第一百十九回则谓该外藩原是要买个使唤的女人,后听说贾家是世代勋戚,便说:“了不得!这是有干例禁的,几乎误了大事!况我朝觐已过,便要择日起程,倘有人来再说,快快打发出去。”虽然巧姐的生平与曹寅次女或许八竿子打不着,然因雪芹姑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姑有远嫁蒙古的特殊遭际,故他很可能就将蒙古藩王置入《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一般汉人作者大多无此知识经验,无怪乎,清代章回小说中罕见此等角色。

又,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胤禛奏为皇父赏克食谢恩摺》满文译本有云:“前交付与茶上人曹奇甚多克食,臣等尚未食竣,皇父又施恩赏与,臣谨受领谢恩,恭藏缓食。”^[75]此曹奇应即甫出继长房曹寅支的曹頔,^[76]他当时之所以奉差携御赐的“克食”(为满文 *kesi* 之音译,原意为“恩赏、赏赐”,可以是任何种类的食物^[77]),远赴青海给正领军的皇十四子胤禛(*in jeng*),除与其茶上人的工作内容相关外,或亦想公私两便,顺便探望时任胤禛副手的大妹夫平郡王纳尔苏,以及远嫁至青海且已贵为亲王罗卜藏丹津嫡福晋的二妹及其夫婿。

曹寅两婿平郡王纳尔苏和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后均因罪革爵并遭圈禁至死,此或即其事未见曹家亲友之私人载述提及的主因,而其悲惨命运不仅与康、雍之际的西藏战乱关连密切,甚且可能与康熙朝诸皇子夺嗣的政治斗争捆绑在一块。康熙五十七年胤禛授命为抚远大将军、王,讨准噶尔部的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之姪)。五十九年正月胤禛自西宁移军穆鲁斯乌苏,遣平逆将军延信率师入西藏,并令平郡王纳尔苏驻防古木;十月延信击败准噶尔名将策零敦多卜。六十年十月胤禛被召还京,面授方略,由纳尔苏代掌其印。六十一年三月胤禛还军;十月罗卜藏丹津召集众台吉会盟,且攻打不愿顺从的王公台吉;十一月胤禛奉旨驰驿来京奔康熙帝之丧,其抚远大将军印务则以加封辅国公的西安将军延信署理。雍正元年二月叙青海蒙古王公、台吉率部从

征西藏之功,亲王罗卜藏丹津仅加俸银两百两,^[78]而与其不合的郡王察罕丹津则晋亲王;当时雍正帝最宠信川陕总督年羹尧,尽管署理抚远大将军的是延信,但帝以延信所驻之甘州太远为由,于五月二十二日谕将一切事务俱交年羹尧办理;八月罗卜藏丹津胁众台吉叛,劫察罕丹津,并侵掠青海诸部;十月已升贝勒的延信奉旨将其所护理的抚远大将军印送至西宁,交与年羹尧办理征剿罗卜藏丹津军务;另给予延信平逆将军印信,负责防守甘州沿边等处事务。二年三月,年羹尧以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功,封一等公,再赏一精奇尼哈番。^[79]

罗卜藏丹津在胤禛征讨西藏期间,一直期望能因功获授“藏王(意谓“持教法王”)”的崇阶,^[80]但随着胤禛获得皇位,反对势力开始被次第剪除,胤禛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被雍正帝召回京师,纳尔苏亦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将署理的大将军印敕移给辅国公延信,且于次日即起程赴京。^[81]接着,在雍正元年二月叙从征西藏之功时,罗卜藏丹津仅被象征性加了点俸,眼看多年来争取“藏王”的目标明显破灭,他遂起兵反清,且勒令众人呼其头衔为“达赖混台吉”,并各自回复旧日名号,一概不许使用清朝之王、贝勒、贝子、公等封号。^[82]二年三月罗卜藏丹津兵败,遂率残部投奔准噶尔的策妄阿喇布坦。当其乾隆二十年在伊犁被俘时,由于雍正帝曾遗有“罗卜藏丹津至,仍有罪”之旨,故遭善待,^[83]此或也是曹頔家并未在雍正二年罗卜藏丹津逃亡准噶尔后随即遭罪的原因之一。

很巧合地,康雍之际所有掌过或代署抚远大将军印的人,均先后被整肃。雍正三年三月,允禩(胤禛被迫所改之名)遭控先前为大将军时,“任

意妄为,苦累兵丁,侵扰地方,军需帑银,徇情糜费”,故将其自郡王降为固山贝子,且因其与阿其那(允禩)、允禩结党营私等罪,四年五月与子白起同被禁锢于寿皇殿旁,至乾隆帝即位始获释。^[84]年羹尧虽为雍邸旧人,且与隆科多同为拥立胤禛即位的重要推手,但因“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亦于雍正三年十二月被论以九十二条大罪赐死。^[85]

纳尔苏回京后在雍正元年七月奉命掌理上驷院,雍正四年以其“擅责一马甲”为由,永远停俸,^[86]七月更以他“行止卑污,在军前贪劣素着,及署大将军印务,更肆婪赃,索诈地方官银两”,革退并“在家散禁(指不加枷锁但不得出门)”,其爵令长子福彭承袭。纳尔苏当时或因不愿对允禩落井下石而遭罪,即使雍正十三年十月弘历登极时恩赦天下,但纳尔苏因“平日行为恶劣,不安本分,情属可恶”,仍命“在家居住,不许出门”。^[87]同样地,纳尔苏的族伯鲁宾(禄宾)亦于雍正四年二月被控在西宁时党同允禩、允禩,而遭夺贝子爵位,降授辅国公,并没收其佐领。^[88]

据《清世宗实录》的记载,福彭初任平郡王的前几年大致遭冷冻,几乎只被派遣在享太庙、秋分夕月于西郊、春分朝日于东郊、夏至祭地于方泽等场合行礼,并承办福陵、永陵的修理工程,直到十年正月才担任镶蓝旗满洲都统。十一年七月福彭以二十六岁之龄获授定边大将军,敕命中有称:

奉天伐罪,治世之常经,锄暴除凶,安边之远略。逆贼噶尔丹策零,狂悖冥顽,父子济恶,妄欲侵陵我属国,窥伺我边陲,包藏逆心,狡焉思逞。朕以此贼不除,终为众蒙古之臣患,是以命将兴师,声罪致讨……当此乘机决胜之时,必须另简忠诚任事之

亲藩,始克奏肤功而宁边塞,是用命尔为定边大将军,统领满洲、蒙古、绿旗大兵一切事宜。^[89]

他所讨伐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乃雍正二年收容罗卜藏丹津之策妄阿喇布坦的长子。福彭统兵北路时,其母的姑丈傅鼐(曹寅妹婿,曾任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及兵部右侍郎)尝参赞其军,并曾于雍正十二年出使准噶尔,与噶尔丹策零讨论双方休兵以及解送罗卜藏丹津等事。^[90]由于福彭先前从无带兵征战的经验,他且是康、雍两朝负责西北边务的大将军当中最年轻的一位,疑该任命的政治意义恐远高过军事理由,应与其父先前曾于抚远大将军胤禛底下担任副手(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至雍正元年正月间)的背景相关,希望能借用纳尔苏在当地的名望和人脉,且期盼福彭可



黄一农《红楼梦外:曹雪芹〈画册〉与〈废艺斋集稿〉辩证》,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 版

透过亲情劝降其姨丈罗卜藏丹津,至少也可利用两人的姻亲关系缓和蒙人的敌意,难怪雍正帝会颁有“罗卜藏丹津至,仍有罪”之旨!福彭于雍正十三年九月因帝驾崩始被召还,或因其并未完满达成任务,故在乾隆元年三月兵部议叙其统兵北路的军功时,仅核给他“纪录三次”。^[91]

至于雍正元年八月以进藏有功封多罗贝勒的延信,在五年十一月被控与阿其那、阿灵阿、年羹尧等结党,又“阳为不附和允禩,掎[音“掩”]人耳目,而阴与允禩交结”,且侵吞公帑等二十罪,遭革爵,黜去宗室为庶人,并与隆科多在一处监禁,六年六月死于畅春园外囚所,其子孙于乾隆元年三月给红带子,附入玉牒之末。^[92]

这些人所遭到的整肃多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他们皆与曹家有一些戚属关系(图六):纳尔苏是曹寅长婿;年羹尧初娶纳兰成德次女,而继娶的阿济格裔孙素严女,则是曹雪芹好友敦敏、敦诚的堂姑,又,成德之母乃阿济格第五女,曹寅祖父曹振彦曾长期担任阿济格王府的长史;延信是成德妹婿温郡王延寿之弟,其女所嫁阿尔松阿乃阿灵阿子,阿灵阿之父遏必隆与成德之父明珠又皆是阿济格婿。纳兰家介入康熙诸子间的夺嫡之争尤深,如成德弟揆叙的次子永福即娶允禔之女,长子永寿(纳尔苏的儿女亲家)的嫡妻关思柏亦拜允禔为干爹,其家还先后提供了百余万两银给允禔,以帮助他邀结人心。雍正帝显然是在皇位坐稳之后陆续对其政敌秋后算帐,并以“兔死狗烹”的做法大杀功臣。^[93]

由于曹家之旗主多尔衮及家主阿济格早于顺治八年就遭籍没,曹頔及其亲长李煦亦在雍正朝被抄家,曹家亲友的泛交游圈中更不乏有类似遭遇者(图六),知被迫归旗北京的曹雪芹对此类

痛苦经历应刻骨铭心,《红楼梦》中遂涌现相似情节。除荣国府及宁国府外,小说第七十五回中指甄家也被查抄,至于第一百五回描述贾府遭抄家时的过程与细节,以及当事人的神态、言语与心理,更是相当生动。^[94]这些内容应最可能出自熟悉此类悲剧的曹雪芹之笔,而非高鹗或其他人可轻易写就或续成。

四、小结

曹家政经地位的提升,令讷音富察氏的傅鼐愿意娶曹寅妹,曹寅长女更获指婚为平郡王纳尔苏之嫡福晋,次女也被指配给青海亲王达什巴图尔的独子罗卜藏丹津(后袭爵)。这些外嫁女姓的姻娅关系让曹家得以跻身上层社会(图六),而曹寅的外孙福秀娶纳兰家永寿的长女一事,更让曹家从所谓的“包衣下贱”变成与原主子阿济格(虽遭抄没,但其第五女则嫁给纳兰明珠,即永寿之祖)的后代有一些平起平坐的机会。

尤有甚者,在康熙末以迄雍正朝的西域历史舞台上,我们竟然可发现曹家及其亲友(如纳尔苏、福彭、年羹尧、傅鼐、延信、鲁宾、曹頔)的身影,^[95]且往往还扮演要角,此应非纯属巧合,罗卜藏丹津有可能就是其共同的交集与环绕的焦点之一(图七)。康熙五十七年以平郡王纳尔苏为抚远大将军胤禔之副手,有可能即是因其与罗卜藏丹津乃连襟,希望彼此能携手合作。雍正十一年命福彭为定边大将军征准噶尔,或亦期盼能利用他与姨丈罗卜藏丹津间的姻娅关系,至于参赞福彭军务的侍郎傅鼐,更是罗卜藏丹津的姑丈。

曹家虽有不少权贵亲戚,但他们多在政治斗争中选错边,故当曹頔在雍正五年遭革职定罪时,其大姊夫纳尔苏已于四年七月被革郡王且圈禁在家,二姊夫罗卜藏丹津亦早在雍正元年因叛

清逃奔准噶尔而遭削夺亲王爵,令曾有两婿贵为王爷的曹家逃不开“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命运。萧猛或因与曹寅家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互动,故他虽在《永宪录》中曾提到平郡王纳尔苏以罪遭废,并有多处言及罗卜藏丹津的叛清史事,但却为尊者或亲者讳,姑隐二人乃曹寅婿。^[96]

当然,我们尚无法提供曹寅次婿即为罗卜藏丹津的直接证据,这或许就是历史工作者得始终面对的宿命与挑战。但此事正如同玩人像拼图,有时虽最后发现有几块缺片,然从已完成的部分,却仍有机会窥得当事人的身分。本文透过对历史运作以及文献体例的掌握,并以趋近竭泽而渔的态度披沙捡金,终自康熙四十八年至乾隆十七年间曾封王的 141 位宗室与外藩当中,有系统地筛出最佳候选人罗卜藏丹津(图八),此应也彰显了文史工作者在大数据时代所可能开创的全新机遇。更有甚者,该结果亦可与耙梳出的许多相关史事环环相扣(见图八),如:

1. 罗卜藏丹津曾被康熙帝“施恩豢养”,此可与曹寅次婿初任侍卫一事相呼应。

2. 曹寅长女于康熙四十五年以特恩被指婚平郡王纳尔苏,知其次女被指配给青海亲王达什巴图尔之子以笼络和硕特部的可能性颇高。

3. 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曹寅于述职返南后曾在奏折中罕见地使用“过蒙圣恩”一词,此或叩谢皇帝于四十六年十二月为其次女指婚一事。

4. 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上元节蒙恩参加“朝正外藩宴”(罗卜藏丹津应以侍卫身分参与),此有可能是嘉赏他对次女与外藩联姻事的全力配合。

5. 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罗卜藏丹津曾与夫人崔措(chos 'tsho; མོ་འཕྲུ་མོ་)拜访七世达赖,此妻

之名既非藏人亦非蒙人所惯用,或与发音相仿的汉姓“曹”相关。

6. 康熙五十七年命胤禛为抚远大将军时,之所以用平郡王纳尔苏为其副手,或因纳尔苏与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乃分娶曹寅两女的连襟,希望双方能因此形成较紧密的合作。

7. 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曹颀奉差携御赐的克食给正领军的胤禛,或顺便探望时任胤禛副手的大妹夫平郡王纳尔苏,以及远嫁至青海且已贵为亲王罗卜藏丹津嫡福晋的二妹及其夫婿。

8. 雍正十一年命福彭以定边大将军衔征准噶尔,亦或期盼能借用其父纳尔苏在当地的名望和人脉,且希冀福彭可透过亲情劝降其姨丈罗卜藏丹津。

9. 罗卜藏丹津在雍乾两朝是家喻户晓的朝廷罪人,故曹家亲友应无人会在私家载述中故意触痛,官方文献亦因曹家地位不高而未提及。

这些均应可大幅增加罗卜藏丹津即曹寅次婿一说成立的可能性,而其他候选人恐很难找到类此之有利旁证。

前述以 e 考据之法指实曹寅次婿的努力,^[97]不仅打开了红学中的一扇窗,也勾连起曹家姻戚们(如曹寅妹婿傅鼐、曹寅长婿纳尔苏、曹寅次婿罗卜藏丹津、纳尔苏族伯鲁宾、明珠次婿延寿之弟延信、成德次婿年羹尧)在蒙古大草原上所亲历的一幕幕导致多人遭削爵抄家的悲惨史事(图七),并有助于揣摩《红楼梦》中某些情节与作者家事之间所出现的精采对应。更有甚者,透过这部由大历史、家史与小说所混融的史诗型大歌剧(Grand opera),我们除可深刻品味蕴藏在《红楼梦》中那股历史感醇厚的醍醐味,更可看到曹雪芹所嵌入带有其家族独特 DNA 的水印(“曹寅二

女皆王妃”)。而在笔者进行本研究之前,应无人知道曹家及其亲友们在中国西北疆域的奠定过程以及康熙皇子夺嫡的政治斗争当中,曾有如此深的介入。

类似的特殊水印,亦可见于《红楼梦》第十七、八回中元妃省亲的情节,笔者发现此应是曹雪芹改编自发生在顺懿密太妃身上的两件世所罕闻之异事:一是她于康熙三十八年随驾南巡时寻得音讯已绝二十年的父母,二是她于乾隆初年成为首位被允许出宫归省之嫔妃。由于密妃的长孙弘庆(雍正九年袭多罗愉郡王)与曹寅的外孙福秀均是纳兰家的贵婿,且福秀的另一位连襟永(嘉庆二十一年以子贵被追封为礼亲王)更是雪芹的至交,故他应有多重渠道可得知此宫闈秘闻。^[98]

至于在小说第六十三回所铺陈的情节当中,曹雪芹也很巧妙地作贱其最大仇家塞楞额和胤

禎(他俩乃导致曹頔遭革职抄家的罪魁)。这些与曹家有着特殊渊源且深烙悲苦印记的家史,很可能就是作者在创作这一回时的重要素材,亦绝难可全归诸巧合!^[99]

曹雪芹应万万没想到,其支持者在两百多年后,还可找出他留在作品中的此种淡淡却又无法抹除的水印,并用来维护他对《红楼梦》的著作权。然面对现今红圈中的乱象(近年已有数十名人选被次第提出,企图挑战并取代曹雪芹的作者地位),该努力恐一时仍无法涤清网络或媒体中所屡屡出现的那些为耸人听闻而创造出的无根妄说。

后记

本文自一百多位曾封王的宗室与外藩当中,衡情酌理后筛出曹寅次婿最佳候选人罗卜藏丹津的过程,绝非是“先射箭再画靶”,因笔者先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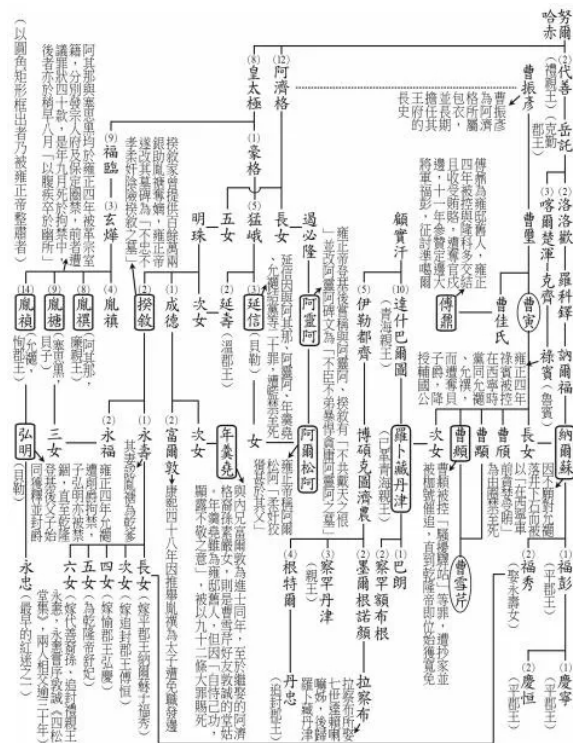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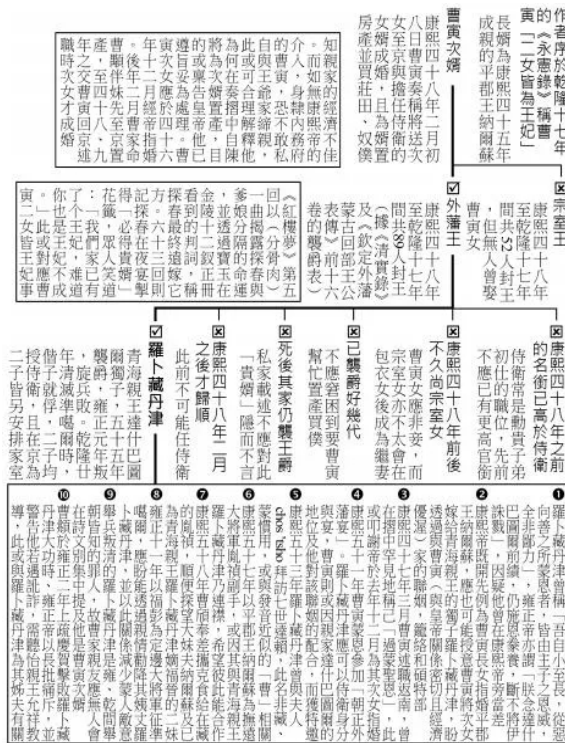


图7 本文中所提及之与曹寅加相关的人脉网络



图八 指实曹寅次婿为罗卜藏丹津的论证过程

对这段史事全属陌生,后偶与中研院政治所的吴玉山院士聊及该发现,他竟然不仅知晓其人,并告知罗卜藏丹津是国际关系史领域多会触及的重要案例,笔者遂开始仔细梳理此一杂揉大历史、家史与小说,且从大观园跨越到大草原的精采故事。

附录一:曹寅次婿与《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封王者。

从《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前十六卷中的各袭爵表,可整理出在康熙四十八年至乾隆十七年间,共有84位外藩曾被封为郡王或亲王,经逐一耙梳各人的经历后,发现此书中的这些外藩王应均非曹寅次婿的可能人选。下文即分类各举二例论证之:

一、康熙四十八年之前的名衔已高于侍卫(侍卫通常是年轻勋贵子弟初仕的职位,先前不应已有更高官衔)

1. 额林陈(臣)于康熙四十九年正月晋封喀尔喀多罗郡王,然其于四十七年三月已封多罗贝勒,^[100]故不太可能于四十八年担任远低于此的侍卫一职。

2. 察罕丹津于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封青海多罗郡王,然其于四十年正月已封多罗贝勒。^[101]

二、康熙四十八年前后不久尚宗室女(因曹寅已是内务府的方面大员,故不应会以次女为某侍卫之妾媵,尤其还得陪带大量嫁妆。再者,康熙帝也不该指配其女为人做妾。至于有爵之宗室女,应亦不太会在包衣女之后成为该穷困侍卫的继妻)

1. 阿宝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封厄鲁特多罗郡王,但他在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即已因尚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女而授和硕额駙,四十八年二月又已袭

扎萨克多罗贝勒。^[102]

2. 色布腾旺布于雍正七年五月袭兄爵,封厄鲁特扎萨克多罗郡王,复授厄鲁特盟长,不附准噶尔。其父阿喇布坦于康熙四十一年降清,封郡王。色布腾旺布在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因尚固山贝子允禔长女(四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生)而被封额駙,故不太可能在四十八年已先娶曹寅次女为妻。亦即,允禔长女应不会愿意嫁为妾室或在包衣女之后为继妻。且色布腾旺布的嗣子朋素克虽于乾隆十三年降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仍世袭罔替。^[103]

三、已袭爵好几代或死后其家仍袭王爵(不应窘困到要曹寅帮忙置产买仆,而曹家亲友也不应在诗文中对此“贵婿”皆隐而不言)

1. 阿喇布坦(阿拉卜坦)于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袭父岱布爵,封科尔沁多罗郡王。其高祖彰吉伦于顺治七年晋扎萨克多罗郡王,且诏世袭罔替,直到乾隆四十八年索特纳木仍袭扎萨克多罗郡王。^[104]

2. 伊达木扎布于康熙五十六年七月袭父爵,封喀喇沁杜楞郡王,五十八年十二月尚和硕诚亲王允祉女,授和硕额駙。其所属的喀喇沁部在天聪三年即归附,曾祖班达尔沙在康熙七年已晋多罗杜楞郡王,长子喇特纳锡第于乾隆四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楞郡王,四十八年还赐亲王品级。^[105]故若伊达木扎布是曹寅次婿,不应无人提及。且他应不致窘困到结婚时还要岳家帮忙置产。

事实上,由于《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袭爵表中这些候选人所袭之王均为世袭罔替,故几乎皆可用第三类(已袭爵好几代或死后其家仍袭王爵)的理由加以筛除,且许多案例往往符合不止一类理由。

附录二：曹寅次婿与《清实录》中的封王者。

检《清实录》中所记康熙四十八年至乾隆十七年间曾封王的外藩，发现有5名不见于《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袭爵表，^[106]其中除罗卜藏丹津外（详见正文），皆可被排除为曹寅次婿，现将其理由逐一略述于下：

一、康熙四十八年之前的名衔已高于侍卫

1. 扎萨克多罗贝勒博贝于雍正八年十一月追封郡王，他于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即以贝子衔管西路右翼右军事，四十三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四年九月封辅国公。^[107]

二、已袭爵好几代或死后其家仍袭王爵

1.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追封绝嗣的青海贝子丹忠（衷、仲）为郡王，同时封其伯父察罕丹津（插罕丹进）为亲王。^[108]由于丹忠其家一直颇受清廷重视，故他若是曹寅次婿，大家不应对其皆隐而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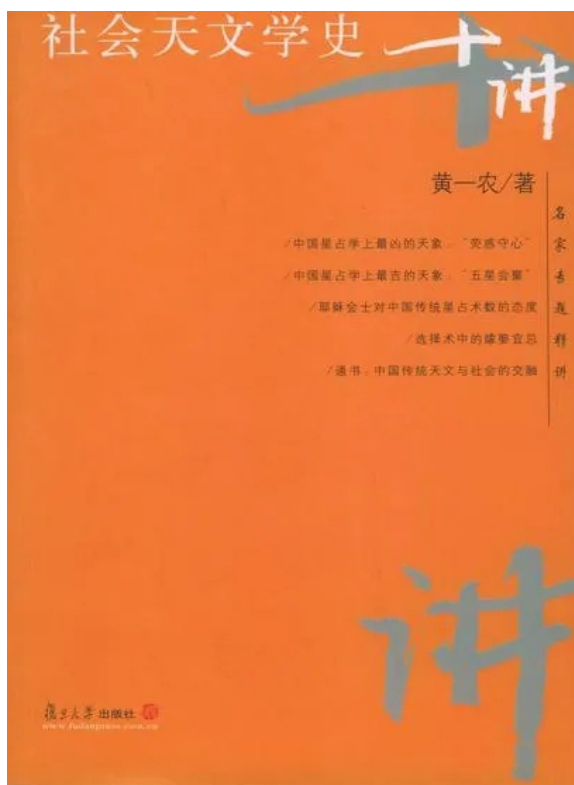
三、归顺时已在康熙四十八年二月之后（曹寅次婿在康熙四十八年二月之前即已任侍卫）

1. 颇罗鼐于乾隆四年十二月由贝勒晋封郡王，^[109]他于康熙五十九年定藏后始被封为噶隆，此前并未归附，故不会到北京当侍卫。^[110]

2.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因其父颇罗鼐病故，于乾隆十二年三月袭封郡王，因敕谕中称“值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年幼新袭之时”，^[111]知其此时尚未

成年，故不可能在康熙四十八年担任侍卫。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于乾隆十五年十月以叛逆被诛。^[112]

至于《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袭爵表中为何未见这五人，此因博贝和丹忠二人的郡王衔乃属追封而非实授，而罗卜藏丹津、颇罗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三人，则因其或其家人叛清遭褫爵，以致未被收入前引书之表。



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 允禄等编，《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51，页12。

[2] 此段参见李锴，《李铁君先生文钞》（沈阳：辽海书社，景印《辽海丛书》本，雍乾间成书），卷下，页32-34；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景印《四部备要》仿宋活字排印本），卷2，页5-7。

[3] 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新竹：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4），页155-156。

[4]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42。

[5] 宗谱编纂处编，《爱新觉罗宗谱》（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景印1938年铅印本），册乙，页3207-3215。

[6] 《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清代各朝实录均同此本），卷126，页841。

- [7] 允禔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二十九年成书),卷 58,页 37。
- [8] 纳尔苏生于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十一日,在此假设曹佳氏的生年亦近于此。
- [9]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页 63。
- [10] 曹寅在康熙四十五年的奏折中称其妻于八月上船“奉(长)女北上”,但在此处则称“送(次)女同往”,使用下对上的“奉”字,应是因纳尔苏在十七岁成婚时已袭封郡王数载,而次婿当时仅为侍卫,故用“送”字。参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页 42。
- [11] 萧猛(原误萧爽)撰,朱南铎点校,《永宪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续编,页 390-391;李世愉,《李盛铎藏清钞本〈永宪录〉读后》,《清史研究通讯》,1986 年第 1 期,页 37-40、24。李世愉虽在三十多年前即已撰文正确点出此书作者之名,但其说却罕见学界留意。
- [12] 高树伟、黄一农,《〈永宪录〉的作者及其版本小考》,撰写中。
- [13] 《永宪录》中通常称雍正帝为“上”,另有六十几处“今上”则几乎全可证明指的是乾隆帝,知其成书于乾隆朝。至于正文最晚的记事乃“今上十六年南巡”,系于乾隆十六年。虽然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李盛铎原藏清钞本中,有小注提及乾隆三十四年之事,但此类小注很可能为后人所补,因萧猛当时或已逾九十岁以上(他在康熙三十五年已为府学恩贡生,通常至少二、三十岁)。鉴于萧猛留有“乾隆十七年岁在壬申嘉平上浣”的自序,故本文暂以此为《永宪录》的记事下限。这已在曹家遭抄没之后二十多年,而曹寅次婿亦已约六十岁左右。参见萧猛撰,朱南铎点校,《永宪录》,续编,原序及页 395。
- [14] 譬如学界先前所知的平郡王纳尔苏娶曹寅长女一事,就只见于《爱新觉罗宗谱》以及《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所辑录的官方档案,而未出现在私人载述。
- [15] 兰良永,《红楼梦文史新证》(香港:朝夕出版社,2019),页 133-145。
- [16] 清初虽有汉人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孙可望等人封异姓王,但此后则不再封汉人为王。又,朝鲜及安南国王亦获清朝册封,惟他们均无在清宫廷侍卫的情形。至于最受乾隆帝恩遇的满人福康安,也只是生封贝子、卒赠郡王,其父傅恒亦因此被推恩追赠为郡王衔。参见黄一农,《史实与传说的分际:福康安与乾隆帝关系揭秘》,《汉学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2013),页 123-160。
- [17] 事实上,整个清代除平郡王纳尔苏于康熙四十五年娶通政使曹寅之女为嫡福晋外,仅多罗顺承郡王伦柱(1772-1823;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生,五十一年二月袭多罗顺承郡王)曾娶八品官老格之女曹佳氏为侧福晋。参见宗谱编纂处编,《爱新觉罗宗谱》,册乙,页 3205、3409。参见海青,“爱新觉罗宗谱网(<http://www.axjzlp.com/elan1.html>)”,此为目前唯一针对清代玉牒所设计的数据库,虽仍无法进行全文检索,但已可提供许多有用的搜寻。
- [18] 张廷玉等,《皇朝文献通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五十二年成书),卷 255;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点校本,民国十七年成书),卷 209-211。
- [19] 由于蒙古姓名的汉字对音常无定字,故在耙梳资料时往往不易周全,如罗(洛)卜(布)藏(臧)丹津(金、尽、进)名中各字皆有一些不同对音,因而出现颇多变化组合,其父达什巴图尔亦有扎什巴图尔、札什巴图尔等异名。更有甚者,同一书中亦偶有使用异名的情形,如《清实录》中即有罗卜藏丹津、罗卜臧丹津及罗布藏丹津三种写法。
- [20] 达什巴图尔另有一名养子,他在罗卜藏丹津掌权后移居它处。参见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三十五年成书),前编,卷 3,页 6;B. Szcześniak, “The Description and Map of Kansu by Giovanni Battista Maoletti de Serravalle,” *Monumenta Serica*, 18 (1959), pp. 294-313。
- [21] 罗卜藏丹津事迹均请参见祁韵士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五十三年成书),卷 72,页 3、卷 81,页 15-44;《清圣祖实录》,卷 260,页 565、卷 270,页 655;赵尔巽等,《清史稿》,卷 522,页 14451-14458;齐光,《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以阿拉善和硕特部研究为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页 142-204。
- [22] 此据钱陈群的《平定准噶尔诗》。参见董诰等,《皇清文颖续编》(《续修四库全书》景印嘉庆间刻本),卷 59,页 30-31。
- [23] 《清高宗实录》,卷 593,页 602;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页 704。
- [24] 由于《玉牒》中未见罗卜藏丹津的两子(无任何爵衔,仅为侍卫)娶宗室女,故应是以一般旗人为婚配对象,其情形与曹寅次婿有些相似。参见祁韵士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81,页 42;傅恒等,

-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14，页16；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页704。
- [25]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中的“备指额驸”续谈》，《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3期，页78-81。
- [26] 《清圣祖实录》，卷174，页883、卷177，页907。
- [27] 《清圣祖实录》，卷178，页916。寨桑与台吉皆为蒙古部落首领的头衔，出身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者为台吉，否则称寨桑。
- [28] 《清圣祖实录》，卷182，页950。
- [29] 《清圣祖实录》，卷185，页976。
- [30] 叶崇贤在一份青海古地图上曾以意大利文记称：“去岁冬季，大汗82岁时故去。其妻(moglie)二人，(仅)有一男。此男22岁承继其权(succeduto nel governo)。”因达什巴图尔卒于康熙五十三年九月，知罗卜藏丹津在康熙五十四年虚岁二十三岁（西方文献中的22岁）时，接掌其父的统治权，回推其生年为康熙三十二年，先前有学者误推成前一年。参见房建昌，《从罗卜藏丹津的生年看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叶崇贤对青海史地的描写和价值》，《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4期，页108-111。
- [31] 《清圣祖实录》，卷204，页84-85。
- [3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硃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184-185；《清圣祖实录》，卷205，页92。
- [33] 年羹尧的满文奏折先前虽已有译本，但为求精确，下文凡可查得满文原档者，皆由本文作者之一吴国圣重新细译。此条译自台北故宫所藏满文宫中档编号156832，原译可参见年羹尧撰，季永海等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页17-18。
- [34] 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17，页17-18。
- [35]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页25、64、78；黄一农，《曹寅在京宦历新考》，《明清小说研究》，2020年第2期，页232-249。
- [36] 黄一农，《史实与传说的分际：福康安与乾隆帝关系揭秘》。
- [37] 曹家三代虽皆有人出任侍卫（曹玺、曹寅、曹荃、曹頔），但和这些厄鲁特侍卫并非在同时期任职。
- [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硃批奏折全译》，页94。
- [39]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页424-427、676-695。
- [40] 曹寅次婿在成婚时只是一名侍卫，即使他是青海亲王达什巴图尔之子，其身分也远比不上已袭封平郡王数年的长婿纳尔苏。
- [41] 曹寅，《楝亭诗别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景印康熙间刊本），卷3，页7。
- [42] 曹寅，《楝亭文钞》（《续修四库全书》景印康熙间刊本），页4-5。
- [43] 李振裕，《白石山房文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诗文集汇编》景印康熙间刊本），卷10，页15。
- [44] 《清圣祖实录》，卷241，页402。
- [45] 罗卜藏丹津之父达什巴图尔虽为初封之亲王，但因当时举部逃避噶尔丹之乱，故经济条件恐不佳。
- [46] 此书为清代四大活佛之一的第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章嘉若必多结，1717-1786）于1758-1759年间所著，记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之生平传记，其内容详实可信，为这段时期的藏区历史提供了另一视角的观点，并保存他处未见的重要史料。有关此书的相关讨论可参见A. И. Востриков, *Тиб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2), p. 307。
- [47] རྩུང་སྐུ་རྩུ་ལོ་ལ་པའི་རྩོ་རྩེས་《དཔག་བསམ་ཤིན་པོ་ཆེའི་སྒྲེམ་》（ལྷ་ས་：བོད་རྒྱུ་རྩུ་ལོ་ལ་པའི་རྩོ་རྩེས་，1990），页48。
- [48] 《满愿宝穗》一书兼具实录及追记史事之功能，故此书在罗卜藏丹津尚未袭亲王时，行文中除直称其为“罗卜藏丹津”外，有时亦会以后来之贵衔“亲王”概括尊称。
- [49] རྩུང་སྐུ་རྩུ་ལོ་ལ་པའི་རྩོ་རྩེས་，《དཔག་བསམ་ཤིན་པོ་ཆེའི་སྒྲེམ་》，页116。
- [50] རྩུང་སྐུ་རྩུ་ལོ་ལ་པའི་རྩོ་རྩེས་，《དཔག་བསམ་ཤིན་པོ་ཆེའི་སྒྲེམ་》，页154。
- [51] 查索 rKts、thlib、ESUKHIA、ACIP、OSBL、Adarsha、BDRC 等藏文经典的大型数据库，在所有可稽藏语文献（甘珠尔、丹珠尔、苯教藏经、先贤文集）中，“chos 'tsho”一词几乎不曾出现。再耙梳 BDRC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数据库，可知仅有两男性的名字内可见此元素，其中一位来自回鹘地区，并非藏族；另一位因是孤例，恐有刻本漫渎、误字的危险。但在藏族罕用此名且藏语文献亦罕见此语的情况下，七世达赖的母亲却恰好名为 རྩུ་བཟང་ཆོས་པའི་པོ་ཆེ་ (罗卜藏崔措，blo bzang chos 'tsho)！而罗卜藏丹津与其嫡夫人崔措之名，连起来恰为七世达赖母亲之全名，此恐非偶合，有可能是达赖喇嘛取其母名之后半，赐名与罗卜藏丹津的嫡夫人所致。至于达赖母名“chos 'tsho”的两个音节，恰与汉语“曹”字发音相仿，不知是否为

达赖赐名之灵感来源?

- [52] 此条重译自台北故宫藏满文宫中档编号 157164, 先前译文可见年羹尧撰, 季永海等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 页 52-53。
- [53] 《清世宗实录》, 卷 8, 页 159; 祁韵士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卷 82, 页 47; 郭胜利,《有关康熙朝阿尔布巴一则史料之考证》,《清史研究》, 2010 年第 4 期, 页 95-102。
- [54] 此条重译自台北故宫藏满文宫中档编号 155837, 先前译文见年羹尧撰, 季永海等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 页 162-163。
- [55] 台北故宫藏汉文宫中档编号 023268。
- [56] 郑珍,《亲属记》(《续修四库全书》景印光绪十二年刊本), 卷 1, 页 21。
- [57] 台北故宫藏满文宫中档编号 156803、157141, 以及汉文宫中档编号 023270;《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第 26 辑(台北: 故宫博物院, 1980), 页 440。
- [58] 《清世宗实录》, 卷 19, 页 312。
- [59] 《清世宗实录》, 卷 1, 页 1-3。
- [60] 祁韵士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卷 81, 页 42。
- [61] 如在傅恒等奉敕编纂的《平定准噶尔方略》中, 其名即出现 139 次。傅恒与曹寅外孙福秀乃同娶纳兰氏永寿女的连襟。
- [62] 兰良永,《红楼梦文史新证》, 页 137-139。
- [63] 康熙朝有所谓“万国乐春台”的火戏,“象四征九伐, 万国咸宾之状, 纷纶挥霍, 极尽震炫而后已”。参见徐尚定标点,《康熙起居注》(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册 7, 页 403-416; 毛奇龄,《西河合集》(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古籍珍本丛刊》景印康熙间刊本), 诗话, 卷 5, 页 13-14; 张小李,《清宫上元节外藩宴与藩属关系考论》,《中国文化》, 第 40 期(2014), 页 80-95。
- [64] 蒙语中可指颜色, 但亦可指人的容貌、姿色、脸色、气色, 或牲畜的毛色。
- [65] 徐尚定标点,《康熙起居注》, 册 7, 页 407、412。
- [66] 班固等,《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点校本), 卷 8, 页 260。
- [67] 曹寅与李煦虽奉旨于康熙四十三至五十二年间轮管两淮盐务, 但形式上仍每年钦点两淮巡盐御史。《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页 22-23。
- [68]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页 47-56、76、78、93。
- [69] 该次返京时曹寅仅面圣两次, 而四十七年二月初三

日应较不可能, 因二月十一日曹寅即离京, 较难有时间安排与次婿处理相关事宜。

- [70] 他通常是用伏蒙圣恩、荷蒙圣恩、蒙圣恩、仰荷圣恩、叩谢圣恩、幸蒙圣恩、叨蒙圣恩、蒙皇恩、仰报皇恩、上赖皇恩、叩谢皇恩等词, 总计约八十几次。
- [71] 主要是省亲事, 作者以“王妃”隐写姓王的妃子, 而密妃的长孙弘庆与曹寅外孙福秀即是同娶纳兰永寿女的连襟。参见黄一农,《二重奏: 红学与清史的对话》, 页 275-312。
- [72] 张庆善,《惠新集: 红学文稿选编》(北京: 时代华文书局, 2016), 页 209。
- [73] 丁维忠,《红楼梦: 历史与美学的沉思》(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页 306-338。
- [74] 六桥是正白旗三多(1871-1940)的号, 蒙古姓为鍾木依氏, 汉姓张, 历官库伦办事大臣、东北边防司令谘议等职, 著有《可园诗抄》《可园诗抄外》《库伦奏议》等。参见胡文彬、周雷,《红学丛谭》(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 页 195-206。
- [7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硃批奏折全译》, 页 1440-1441。
- [76] 曹頔后又归宗。参见黄一农,《二重奏: 红学与清史的对话》, 页 120-136。
- [77] “克食”不一定是点心, 清代谢恩摺中即有各种食物做为“克食”之例, 如称“克食鹿肉”“克食风羊”。《红楼梦》第一百十八回记莺儿端了一盘瓜果说:“太太叫人送来给二爷吃的, 这是老太太的克什。”此处为撤下的供品。
- [78] 其亲王俸禄原本为岁给银二千两、缎二十五疋。当时罗卜藏丹津率五、六百兵至藏, 许多人水土不服, 且有称其与准噶尔作战时并不积极。康熙六十一年五月其两母福晋更以年老思子为由, 出面奏请让他返回青海。参见吴丰培编纂,《抚远大将军允禔奏稿》(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刊中心, 1991), 卷 18, 页 43-44、卷 20, 页 7-8; 允禔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 卷 51, 页 41。
- [79] 周远廉主编,《清朝兴亡史》(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16), 卷 4, 页 193-262。
- [80] 台北故宫藏汉文宫中档编号 023892 及 024408。
- [81] 《清世宗实录》, 卷 1, 页 33、卷 3, 页 80。
- [82] 《清世宗实录》, 卷 10, 页 191。混台吉又作“浑(琿)台吉”, 是蒙古王族中的头衔, 相当于副汗。
- [83] 祁韵士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卷 81, 页 42。

- [84]《清世宗实录》，卷39，页566、卷44，页642-643。
- [85]《清世宗实录》，卷30，页461、卷39，页568-572。
- [86]《清高宗实录》，卷679，页595；宗谱编纂处编，《爱新觉罗宗谱》（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景印1938年铅印本），册乙，页3205。
- [87]《清世宗实录》，卷4，页225-226、卷46，页701；《清高宗实录》，卷4，页226。
- [88]《清世宗实录》，卷41，页606、卷42，页622。
- [89]《清世宗实录》，卷133，页717-718。
- [90]赵令志、郭美兰，《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9），卷上，页818-837。
- [91]《清高宗实录》，卷15，页417。
- [92]《清世宗实录》，卷64，页980-982；宗谱编纂处编，《爱新觉罗宗谱》，册丁，玉牒之末，页1。
- [93]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页438-448。
- [94]尹伊君，《红楼梦的法律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页240-248。
- [95]虽然濮德培在其讨论十八世纪准噶尔灭亡的经典著作中并未及此，但相关的大时代背景仍可参见其书：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96]萧猛撰，朱南铎点校，《永宪录》，页120、134、146、154-156、159、175、206、228、308。
- [97]类似研究如见黄一农，《从e考据看避讳学的新机遇：以己卯本〈石头记〉为例》，《文史》，2019年第2辑，页205-222；黄一农，《“e考据”厄言：从曹雪芹叔祖曹荃的生辰谈起》，《清华学报》，新50卷，第4期（2020），页555-586。
- [98]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页275-312。
- [99]黄一农，《试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讥刺仇雠的隐性手法》，《中国文化》，第52期（2020），页1-19。
- [100]《清圣祖实录》，卷232，页321、卷241，页396。
- [101]祁韵士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1，页3；《清圣祖实录》，卷203，页70、卷283，页769。
- [102]祁韵士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1，页1-2；《清圣祖实录》，卷212，页156、卷236，页323。
- [103]祁韵士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0，页22、卷77，页13-15。
- [104]张廷玉等，《皇朝文献通考》，卷299，页16；祁韵士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页11-12。
- [105]祁韵士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2，页1。
- [106]但若只检索康熙四十八年至乾隆十七年间的《清实录》，则会发现有17名在这段时间曾封王的外藩，在实录中并未具体记载其袭爵的史事，而其中7名首次以郡王或亲王衔出现在实录时，已在乾隆十八年（含）以后。知欲完备封王者的名单，必须同时把梳《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和《清实录》，并以之互补。
- [107]《清圣祖实录》，卷155，页713、卷215，页179、卷222，页235；《清世宗实录》，卷100，页333；祁韵士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9，页4、卷63，页4。
- [10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4，页110；台北故宫藏汉文宫中档编号024410。后者误察罕丹津为丹忠之亲兄。
- [109]《清高宗实录》，卷106，页595。
- [110]《西藏记》（板桥：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集成》本），卷上，页5。
- [111]《清高宗实录》，卷286，页737-738。
- [112]《清高宗实录》，卷379，页1213、卷383，页35。
- （黄一农：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吴国圣：历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本文原刊《中国文化》2021年秋季号）

宋辽金史研究院



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成立于2020年，是我校无行政级别的实体科研单位，于2021年正式获批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宋辽金史研究院依托西北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涉及中国语言文学、法学及艺术等相关学科，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态势。目前研究院下设宋史研究中心、辽金史研究中心、宋辽金文化研究中心等三个分支部门。本研究院立足于基础性、理论性研究，主要研究特色在于对中国宋辽金时期历史的研究，重点关注宋代军政关系、政治制度、宗族与社会、思想文化及法律，辽金社会史及历史文献等领域。

研究院挂靠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并整合学校内宋辽金史方向相关研究力量，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拥有专职科研人员15人，其中教授、博导7人、副教授4人、讲师4人。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陈峰教授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现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是宋代军政史研究方面极具影响力的专家。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善军教授获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称号，



是辽金史与中国家族史研究方面极具影响力的专家。另外，副院长胡坤教授，以及王明荪教授、成明明教授均是各自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还有张明副教授、王军营副教授、马泓波副教授、贾连港副教授、顾成瑞博士、王振华博士、郑旭东博士、吴红兵博士及张辉博士等一批学者，都是极具潜力的青年才俊。

为了进一步强化研究院研究团队的学术力量，研究院聘请了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包伟民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华瑞教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杜建录教授等6人为兼职研究员。此外，研究院成立了学术委员会，聘请李华瑞教授担任主任，校外学术委员包括：北京大学的邓小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包伟民教授、河南大学的程民生教授、上海师大的戴建国教授、吉林大学的程妮娜教授、河北大学的姜锡东教授、宁夏大学的杜建录教授、中山大学的曹家齐教授、华东师大的黄纯艳教授等国内辽宋夏金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近年来，研究院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如陈峰

教授的《印象·中国历史·宋朝卷：文治之路》（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王善军教授的《宋代世家个案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胡坤教授的《宋代荐举改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等等。2021 年 8 月，陈峰教授的新著《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增订本）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库（第二辑）》出版，因该文库始终秉承以思想性、学术性、原创性与可读性作为选书标准，使其成为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丛书之一，其入选图书均为各学科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2021 年 10 月 7 日，研究院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召开了“宋辽金史研究新进展暨《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增订本）新书研讨会”。西北大学副校长吴振磊教授与参会专家充分肯定了陈峰教授著作的学术价值。

此外，研究院人员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等权威期刊发表了一系列系列高水平论文，如陈峰教授的《宋太祖朝的曲宴及其政治功用》（《历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胡坤教授的《评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兼谈孙应时改官的问题》（《中国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贾连港副教授的《南宋初年中央统军体制的调试及其运作方式研究——以御营使司的兴废为线索》（《中国史研究》2021 年第 4 期）、王军营副教授的《宋代“殿前指挥使”名称及官长考论》（《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2 期）等等，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学术成果先后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奖项。

近年来，研究院获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如陈峰教授主持的国家“十四五”发展

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第八卷（辽宋夏金卷）（2020 年）、王善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辽宋西夏金元族谱文献整理与研究”（2019 年）。此外，获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有陈峰教授的《宋代治军理念与朝政关系研究》（2018 年）、胡坤教授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编纂与版本研究》（2017 年），获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含青年、西部项目）有王善军教授的《宋代官宦世家群体研究》（2018 年）、成明明教授的《岁时节俗与宋诗研究》（2019 年）、贾连港副教授的《中央统军体制与南宋政权的秩序构建研究》（2018 年）、王振华博士的《孙吴简牍文书与地方行政研究》（2019 年）、吴红兵博士的《宋朝对十国旧疆善后治理研究》（2019 年）、顾成瑞博士的《官阶优免与唐代赋役体系运行研究》（2021 年）。下面就研究院在研的两项重大科研项目作简要介绍。

由陈峰教授主持，研究院王善军教授、胡坤教授、贾连港副教授等人参与的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第八卷（辽宋夏金卷）。2020 年 6 月，为期五年的 30 卷本《（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这是党中央确定的重大学术任务，也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重大工程。中央领导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将这项工程视为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民族精神的战略之举，要求完成体现思想穿透力的精品之作。西北大学承担《（新编）中国通史》中的《辽宋夏金》卷主编的任务，为全国西部省份中唯一的牵头主编单位。承担这项国家层面的重要工作，不仅表明了西北大学在宋辽金史研究领域拥有国内权

威学术地位,也彰显了我省史学界拥有加入“国家队”的能力。

研究院以该项目为抓手,一方面召开多场学术会议,如2021年12月19日,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召开了“线上+线下”模式的“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新编)中国通史》(辽宋夏金卷)征求意见会”。会上,陈峰教授介绍了项目进展情况。与会的国内辽宋夏金领域知名学者围绕着《(新编)中国通史》(辽宋夏金卷)的纂修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并商议如何依托此项目,开展讲座、工作坊、学术会议等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加强辽宋夏金各领域专家学者的互动,探索“大宋史”研究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围绕《(新编)中国通史》(辽宋夏金卷)的编纂工作,产出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除了一般学术论著外,还有多篇历史经验类咨政建言报告,如陈峰教授的《过度求稳导向下的宋朝施政及其启示》、王善军教授的《辽宋西夏金时期的中华一体意识对当前国家观念建设的启示》、胡坤教授的《宋朝文官制度对推进国家之礼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事》、杜建录教授的《西夏历史研究中必须加强的几个问题》。

由王善军教授主持,研究院陈峰教授、胡坤教授等人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辽宋西夏金元族谱文献整理与研究”。该课题遵循科学的研究思路,拟对辽宋西夏金元时期的中国族谱文献进行全面搜集和系统整理,并进行文献学和社会史的研究,用文献学方法对族谱文献的版本、时代、流传、作者、体例、内容辨伪等方面进行考辨、合理分类、编目与汇编。从社会史角度入手,考察分析辽宋西夏金元族谱文献的区域分

布,以及族谱文献中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宗族日常生活、社会教化功能、社会变迁和族谱文献时代特征等问题,分析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状况、社会组织、社会变迁和时代特点,探讨历史发展和文明形态演进的规律。族谱文献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的资料宝库,而辽宋西夏金元时期正是私家族谱定型和发展的关键阶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运用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理论和分析工具,深入挖掘、分析辽宋西夏金元时期族谱文献中的丰富内容,不但对深入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可以古为今用,对树立良好家风、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构建完整的中国族谱学研究体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于2021年10月通过中期评估后,又获得滚动资助经费60万元。

在未来几年,研究院将继续充分发挥学术优势,通过高质量的成果,不断改变我省唐代之后历史研究的不足,以助力文化强省建设;充分发挥平台作用,通过举办系列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及相关学术沙龙、工作坊等方式,扩大我省史学界在国内外的影响,为提升我省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承担面向大众的历史讲座,推出历史知识普及读物,为提高广大群众的历史文化水平出力;关注和探索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为国家现实治理提供历史经验与借鉴。加强本团队建设,打造学术高地,发挥区位优势,为提升我省学术影响力做贡献。同时聚焦国内外学术前沿,开展多维度研究,争取将本研究院建成国内外重要的宋辽金史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学术交流中心、资料收藏中心。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胡可先



胡可先,1960年生,浙江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文学科教指委委员,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学术经历:1982年7月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9年6月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1年7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出站,同年8月至2002年6月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02年6月担任浙江大学教授,2014年12月起担任博士生导师;2016月至2021年11月担任中文系主任。

胡可先主要从事唐代文学研究,并以唐代文学为研究中心,横向拓展到唐代史学与考古学领域,纵向追溯到魏晋南北朝,延伸至两宋。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首席专家。专著有《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

族研究》等十余部。多部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各1次;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次。

主要学术贡献有四个方面:一是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辟;二是政治事件与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三是唐代著名作家研究的推进;四是宋代文学专题研究推出新的成果。

一、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主要成果有《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三部学术专著,以及先后在《文史》《文献》《文学遗产》《文史哲》《北京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等重要刊物发表的《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等系列论文。这些成果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学理与实践两个层次为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的研究空间提供了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尤其是以文学为主题,把传世文献、考古遗物、艺术图像结合起来作形象文学史的研究,尝试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探索一条新的途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08年10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验收情况报告》称:“《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第一次将出土文献,尤其是唐人墓志与唐代诗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论证,开拓了唐代诗学研究的新视野,也为唐诗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社会科学报》2008年12月11日第4版)复旦大学查屏球教授在书评中

说:“《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一书以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的关系为视角,从全面占有唐人出土文献入手,竭力挖掘其中关涉唐代诗人与诗歌创作的大量新资料,充分地吸收与整合已有研究成果,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进行了交叉式、多侧面的综合研究,适时地填补了唐代诗学研究中的空白。”南开大学卢盛江教授在书评中说认为《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由细致的考订、视野的开阔,进而达到学术的会通”。

二、唐代重大政治事件与文学研究

主要成果有《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年)、《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系统地论述了“武周革命与初唐文学进程”;“安史之乱与文学转型”;“牛李党争与文人命运”;“甘露之变与中晚唐文学的交汇点”;“黄巢起义与唐末哀歌”。涵盖了整个唐代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发展演变的进程,可以说是以全新的视角,考察和撰写的一部唐代文学演变史。《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侧重于唐代都城长安为代表的诗坛中心研究和以吴越为代表的南方区域诗歌发展的研究,注重政治影响下的诗坛重心和文学空间的变化,表现作者在政治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另一层面的思考。

三、唐代著名作家专题研究

胡可先对于唐代著名作家多有研究成果。一、杜甫研究。《杜甫诗学引论》(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3 年)侧重于将杜诗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建构,其内容主要有四个部分,包括杜诗学通论、杜诗学史论、杜诗学专论、杜诗学年表。是新世纪以来杜诗学的系

统建构和综合研究的论著。二、杜牧研究。《杜牧研究丛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重点在于杜牧生平的考证、交游的搜寻、作品的编年、真伪的辨证和研究资料的纠谬等,出版后有力地推动了晚唐文学研究的进展。三、李白研究。发表《唐人选唐诗与李白诗》(《中国李白研究》2000 年集)、《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浙江大学学报》2015 年第 5 期)。四、刘禹锡研究。发表《刘禹锡诗文编年新考》(《文史》2002 年第 1 辑)、《新出土刘禹锡书崔迺墓志考论》(《刘禹锡研究》第 1 辑)、《白居易与刘禹锡书事实考证》(《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 5 期)。五、白居易研究。发表《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东南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论〈长恨歌〉的序与传》(《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4 期)、《新出石刻与白居易研究》(《文献》2008 年第 2 期)等。

四、宋代文学文献研究

主要成果有《欧阳修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列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系列。对欧阳修词作之辨伪、编年等做了详尽考订,对词中人名、地名、本事、典故、名物及词句化用等做了深入而全面的笺释,并尽可能地辑录古今学者对欧词的代表性评论,文字考订、词句笺注、资料辑佚三者并举。在秉承传统笺注方法的同时,特别强调以史证词、以词证词、以欧证欧。这样更有助于揭示词这一文体的艺术特质,有助于理解欧阳修的文学世界。《宋代诗词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年),分为五编:一是词人年谱,二是词学研究,三是诗学研究,四是《全宋诗》考补,五是宋代徽州文学研究。《宋词汇评》第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4 年),对于宋末词人词作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汇集。词人方面“词人小传”“传记资料”“年谱”“著述”“总评”;词作方面包括本事”“编年”“汇评”“考证”“附录”。

考古专家——马健



马健,1979年生,陕西省石泉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西北大学仲英青年学者。现任科技部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文物保护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

马健教授1997年至200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获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7~2008年,赴德国慕尼黑大学交流访学一年。先后师从晁华山教授、林梅村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贺东勤(Thomas O. Höllmann)教授。2009年进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工作,专攻中西文化交流考古、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西北史前考古。2001年迄今,长期主持、参与我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内蒙古阴山地区,乌兹别

克斯坦撒马尔罕盆地、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地区古代城市、宗教遗迹、游牧民族遗存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

先后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战国至西汉早期匈奴遗存的考古学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石人子沟遗址群2006~2013年度考古发掘报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东天山地区古代人类分子生物学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疆巴里坤泉儿沟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文物局“新疆巴里坤泉儿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新疆巴里坤海子沿遗址发掘项目”,哈密市文物局“天山北路墓地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等。

出版学术著作《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的兴衰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丝绸之路的宗教遗存》(三秦出版社2015年);译著《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中华书局2012年)、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拜其尔墓地——2004~200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20年)。

在《文物》《考古与文物》《Eurasian Studies》《PNAS》《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The Holocene》《Radiocarbon》《Current Biology》等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马健教授积极推动多学科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协同多单位、多领域专家,联合开展古DNA、古环境、动、植物考古、冶金考古、宝玉石考

古等领域的综合研究。作为通讯作者和团队成员综合运用古病理、3D 几何测量、古 DNA 分析等方法，首次确认了中国早期马匹骑乘的直接证据，该项成果作为封面论文刊登在 2020 年美国科学院院报，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和《纽约时报》、《科学》、《法国国家地理》等多家国际媒体的报导。

学术成果获得多项奖励，译著《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获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2007 年参与的新疆巴里坤东黑沟(今石人子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获评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1 年，作为执行领队主持的“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红山口——石人子沟遗址群考古与保护航测成图与数据库建设项目”荣获国家地理信息科技进步三等奖。2018 年，荣获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青年学者奖(金爵奖)。2019 年荣获陕西“好青年”。马健教授作为团队主要成员，其参与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多次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充分肯定与接见，并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陕西省“三秦楷模”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马健教授勤恳经验，长期承担《田野考古学》、《古代游牧文化》、《专业导读》等本科生主干课程教学和《中国考古学研究动态》等研究生主干课程教学，先后荣获西北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优秀教师等称号。其开设的视频公开课《古代游牧文化》，目前在教育门户网站爱课程、中国 MOOC 平台均在线，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马健教授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方法在教学中的引用，结合地理信息、三维建模、VR 等软硬件技术设备，牵头

设计开发并建成了国内首个沉浸式虚拟互动考古教学实验室，为学生身临其境认知、学习各类古代遗存提供了领先的平台。该实验室受到考古专业学生广泛好评和行业认可，受到新华网、人民网等 20 余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基于该平台开发的网页版“新疆石人子沟遗址 GT1 考古虚拟仿真实验”获批国家虚拟仿真教学实验项目。先后指导五届本科生总计 24 个月的田野考古实习，带领学生在陕西、内蒙、青海、新疆、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等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在实践中手把手培养学生扎实专业技能和科学思维能力，并指导多名学生在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指导学生完成多项国家级、省级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作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学科带头人，马健教授坚持考古学科“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的学术定位，积极推动“一院一策”综合改革，鼓励学科交叉、鼓励学科与行业深度融合、围绕特色优势方向成立七支学术团队，充分释放教师群体创新活力，完善构建以文化遗产价值为核心的认知、保护、传承“三位一体”学科体系。十三五期间，我校考古学科获批国科金 31 项，同比增长 104%；发起并与 17 个国家 54 家单位成立“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联盟”，作为实验室主任和牵头单位与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科学院和最高学府联合申报的“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获科技部批复立项。2021 年，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列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马健教授将与学院师生协力，抢抓机遇，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书推介

◆《黄帝祭文汇编简注》

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由李浩教授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帝祭文汇编简注》，是近年来黄帝祭文资料整理与研究的最新成果，系统搜集整理了宋元以降历朝历代国家祭祀黄帝的祭文文献，兼及和黄帝相关的部分诗词颂赞、黄帝传记、黄帝世系以及研究论文等。全书收录宋代以来的黄帝祭文 120 余篇；附录部分为《黄帝碑志、颂赞、诗歌（选录）》《黄帝传记（三

篇）》《黄帝世系图表》《黄帝研究论文选辑》。并配以黄陵现存的历代祭文碑实物图片及碑文拓片、黄陵景观图片，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将学术性与普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的出版发行，为黄帝文化研究、黄帝陵祭祀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中华文化共同体认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助益，为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贡献了绵薄之力。



◆《杜甫资料汇编》

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刘明华编，中华书局 2022 年 2 月出版。《汇编》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分为唐宋卷、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又据其卷帙多寡分为十三册。作为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杜甫相关的文献极为丰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唐宋时期有关杜诗评论的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给学界带来了极大

的方便。然而金元明清四朝的杜甫研究资料未见整理出版。刘明华于二〇〇四年提出应促进《杜甫卷》全编尽早问世，二〇〇八年底正式启动工作，在已出版的“唐宋之部”的材料基础上，进一步增补，吸纳了最新的《杜甫全集校注》成果，并将资料的收集范围进一步扩充至清末，经过文献调查、汰选资料、文字抄录点校等艰辛历程，历时十八年，终于使我国一千多年的杜甫研究资料汇为全璧。



《杜甫资料汇编》(全 13 册)